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显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陈 显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80 期 2022 年第 3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编	陈 显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主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务主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杨 枫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lyjh.com/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春天的气味

P12



谁的舍人谁的庙

P57

裁缝和剃头匠的诗



Contents

世味流年

- 4 朵拉（马来西亚） 春天的气味
8 刘小敏 南下北上

坊巷春秋

- 12 蔡林 谁的舍人谁的庙
20 管柏华 花巷到南营
27 岬云 福州中山堂的前世今生

八闽文脉

- 33 唐冈 一条巷子的传奇

岁月写真

- 36 郑芳 茶商“何同泰”生死劫
40 江梦笔 国药行咸康参考记

史池钩深

- 44 赵麟斌 宋代：闽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Contents

P44



宋代：闽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P78



高山之巅的诱惑

P83

雨中登云天石廊



双塔视野

- | | |
|--------|-----------------------|
| 51 林 怡 | 林庚白与孙中山 |
| 57 万小英 | 裁缝和剃头匠的诗 |
| 60 孟丰敏 | 花枝空满迷处所 |
| 65 余斯伟 | 毛奇龄和《后观石录》 |
| 69 刘长锋 | 满门忠烈铸雄魂
——唐司马参军刘昌祖 |

闽都世家

- | | |
|--------------|---------------|
| 73 林榕平 / 李 纶 | 林森碑文与陶江林氏族谱轶事 |
|--------------|---------------|

福地山水

- | | |
|--------|------------|
| 78 赖 华 | 高山之巅的诱惑 |
| 83 沉 洲 | 雨中登云天石廊 |
| 87 刘欢欢 | 五月白玉兰（外一篇） |
| 90 青 色 | 草坪之兰 |
| 93 邱泰斌 | 千秋福州山水榕 |

- | | |
|--------|-----------|
| 封面 杨 枫 | 左海即景（摄影） |
| 封二 林德冠 | 牡丹磐石图（国画） |
| 封三 陈 朱 | 淡竹青山（书法） |
| 封底 | 渔翁（清·木雕） |

春天的气味

朵拉（马来西亚）

鲁迅在《喝茶》一文中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

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的南洋人，喝茶不计好坏，不论品牌，也分不清楚红白黑绿青黄茶的种类，所有的茶在南洋人口里都不过是作为解渴用途的煮开的水，喝茶和喝水无甚区别，名称不一而已。

中国改革开放后终于来到福建，刚下飞机格外口渴，热情的亲戚直接把我们接到家里，在五



层楼上有个专门的茶室，大家坐在临海房子的露台上，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美丽海景。

茶桌上备有电水煲、茶壶、茶杯等精致茶具，还有茶果点心。电水煲里的水煮开，小壶冲泡，一人一杯，亲戚笑说喝茶呀喝茶呀，不要客气。看着小小一杯茶水，有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焦躁感。对着相隔很久才初次见面的陌生亲戚，有话不好意思直说，忍了又忍，最后那习惯喝凉开水的南洋人还是抑制不住喉焦唇干，不再犹豫，直截了当要求一杯水。当然可以呀，亲戚即时给我一杯热水。那天喝什么茶，是什么味道，完全没印象。记得的是好不容易等到热水凉了，正要拿起来往嘴里灌，亲戚走过来说，哎呀，这水凉了不可以喝的，她拿走杯子，换杯热水来给我。

那个年代，无论喝茶喝水，皆解渴用也。鲁迅先生说的“好茶”“清福”，离我挺远。

一直到有一回喝到一杯很特别的茶。

“请想象一朵朵已经干燥的花，让热水冲泡过后，徐徐缓缓在杯里再次绽开，让人感受到仿佛已经死过一次，又再度盛放的重生之惊喜。过了一会儿，打开杯盖，氤氲的花香味儿慢慢地飘升上来，不必喝它，就看着花儿在绿色的茶水里盈盈浮动，美好的感受便在心里悄悄地游移展现。”“从那一杯开始，它的浓馥味道不经意地深植心中。开始四处寻觅……”

为了一杯色泽清澈透亮，香味浓郁，名叫“牡丹绣球”的茉莉花茶，我写了这篇文章。

一个朋友到北京旅游回来，带了一罐“牡丹绣球”送给我。

北京人特别喜欢茉莉花茶。送茶的朋友反复强调，这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茶。被古人视为“天香”的白色茉莉花是慈禧的心头爱，在太后掌权的几十年间，宫内女眷唯她一人可佩簪茉莉花。现在回想，当时香水还不流行，这天然的茉莉花香气比工厂制造的香水更加清新自然。慈禧



太后也时常以她爱喝的“茉莉双薰”作为赠送外国使节的礼品。

北京学者朋友告诉我，老北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从早起就喝茶，要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北京人提到喝茶，不必细究，说的就是茉莉花茶。2013年北大孙玉石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喝的就是汤色明亮、滋味醇香的茉莉花茶。被称为文学界一大“吃货”的汪曾祺先生提到他喜欢喝茶，但不喜欢花茶，却在北京喝过老舍先生最好的花茶。要知道老舍先生是出名的“茶痴”，总是一边饮茶一边写作。“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事静观皆自得。”有茶万事足的老舍先生每天无茶不欢，而且坚持只喝清香扑鼻的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在北京等于是茶的代名词，发源地却是在福建的福州，也就是老舍先生的好朋友冰心先生的故乡。老舍先生拜访冰心先生时，总是一进门就大声问：“客人来了，茶泡好了没有？”冰心先生招待好朋友的，当然是故乡馥郁花香的茶。“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这句诗就写在老舍赠冰心的七律里。

恋上“牡丹绣球”的人本来一心想到北京喝当地土产茉莉花茶，读到这段文字，才发现是南洋人的误会。

北京人称为“香片”的茉莉花茶属于“窨花茶”，正是鲁迅先生说的“珠兰窨片”。据说福州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年前的汉代，来自

波斯的茉莉花通过“一带一路”到中国，最终在福州落户。福州民谣“闽江口边是奴家，君若闲时来吃茶。土墙木扇青瓦屋，门前一田茉莉花”写出当地民间喝茶闻花香的生活情趣。

茉莉花在福建武夷山人柳永词里这么美：“环佩青衣，盈盈素靥，临风无限清幽。出尘标格，和月最温柔。”在清代诗人王士禄的眼中如此香：“冰雪为容玉作胎，柔情合傍琐窗开。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清代另一个诗人江奎毫不掩饰他对茉莉的钟情倾心，干脆选为心目中的排行榜冠军：“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

北宋时期，福州人将西方的洁白花儿与东方的翠绿叶子结合，窨制出花香和茶香交织的茶。当茶叶和茉莉花拼合时，“茶引花香，以益茶味”的结果，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花香茶韵，引得古人赋诗形容“冰花舍己芳菲予，雪魄香魂尽入茶”。品尝过花香茶香融合味道的每一个人都无不赞同“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美誉是理所当然。

福州茉莉花茶在历史上有两次鼎盛期。首次崛起是19世纪中期，当时福州茉莉花茶的年产量达1万吨。外国商人到福州开洋行，将花茶外销到欧美和南洋，福州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也是中国花茶生产中心与集散地。第二次的辉煌纪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福州茉莉花茶年加工量将近8万吨，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产值超过15亿元。那是福州记忆中的“千家

万户遍植茉莉，妇孺白首皆焙香茶”和“一担茉莉一担金”的黄金年代。

喜欢茉莉花茶的不只福州和北京人，喝过茉莉花茶的外国人留下的评价亦令人惊艳：“在中国的花茶里，可闻到春天的气味。”享誉国外的茉莉花茶，品尝过的人意惹情牵，念念不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记载：“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毛泽东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他说的是1972年，毛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情景，当时大家喝的就是福州茉莉花茶。

到福州时朋友请喝茶，离开福州时朋友竞相送茶，现在明白福州朋友送茉莉花茶的原因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同时是要“练习出来的”。

从前我的喝茶，就是南洋人的牛饮。后来时常到福州，每年起码要和福州朋友相聚几回，才从爱喝茶、会喝茶的福州人那儿，开始学会享受喝好茶的清福。

新冠疫情反复不断，无法自由出国。2022年春天搬家，为了喝茶，特地在新房子里装修一个茶室。每当想念福州朋友的时候，就到茶室，拿出朋友赠送的茶，从容煮水，慢慢冲泡，小小一杯，细细地品。疫情期间的恐慌不安、焦虑烦躁在缭绕的茶香里逐渐舒缓放松。

冰心先生在作品中提道：“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品着我家的茉莉花茶，在唇齿留香之间，回味春天芬芳的茶韵花香，也让我深深思念福州朋友们美好深厚的情谊。



南下北上

刘小敏

先薯亭的柱子和廊檐为什么是蓝色的？古木葱郁的乌山上，几乎所有的亭台楼阁都涂抹着厚重的朱红，唯先薯亭特立独行。我所能想到的理由是，或者因为薯藤从异邦漂洋过海抵达闽都，蔚蓝色的波涛启发了设计者的灵感？

但这种疑惑只一掠而过，再无细究。就好似这先薯亭，早知晓为纪念陈振龙和金巡抚等引种、推广番薯者而重修，却仅此而已。番薯实在平凡普通，如同空气般随时随地，重要却又令人熟视无睹。记得儿时上学路经三牧坊口，总被小摊烤炉飘来的红薯焦香搅动得馋涎欲滴；三年困难时期米饭上厚厚的番薯钱、番薯米，曾慰藉了几多饥饿口腹……

更有年复一年，从遥远的山东老家邮寄而来的地瓜干！

在我打小的记忆中，山东的“代言物”便属于花生米、地瓜干和手纳鞋垫。鞋垫精致且耐用，但对于孩子们而言食物无疑更具有诱惑力，



先薯亭



地瓜干

尤其地瓜干，土布缝制的邮件总是大袋大袋包裹南下。与闽地生晒、洗粉的番薯钱和番薯米不同，山东地瓜干的做法是去皮切条、蒸熟晾干，制作后泛着白霜般的糖面，糯软且香甜。放学归途玩得又累又饿回到家中，姥姥每每抓上几根让我们先垫垫肚子，在食物并不丰裕的年代何其爽口开心。那些年头，从齐鲁地界翻山越岭抵达八闽的地瓜干包裹肯定不少！1949年进军福建的三野10兵团中多有山东子弟兵，另有1000多山东地方干部紧随南下。包括部队转业地方及多批次抽调到福建的山东南下干部共5000多名，想必他们中很多人的后代如我一般，都怀念老家地瓜干的乡情滋味！

福州的番薯与山东的地瓜有啥勾连？却是从没往一处想。直到几年前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在他的老战友们的回忆录中翻看到一篇文章《与敌人巧周旋》，陡然勾起我的探究之心。

写的是1942年的一桩往事。那年11月，

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亲往青岛部署冬季大扫荡，日伪军拉下大网对马石山周围20平方公里地区形成合围，夜间三五十步燃火一堆，只待天亮收网，声称“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19岁的父亲，不幸也被困于圈内。他与胶东《大众报》的李叔、荣姨结队而行，在暗夜中寻找可以跳出网圈的空隙，东奔西跑，却都被密集的枪弹逼退。跑不出去只能先躲藏起来，隐蔽地点却也难寻。情急之下唯有险中求胜：村庄外一条沙河蜿蜒而去，南边就是马石山，天亮时急于前往合围点的日伪军必定由此拉网而过，想来不会留意眼前平坦的河床。这个“灯下黑”的大胆计划可能实现的关键在于，河滩沙地已被垦殖为地瓜田，收成不久的滩地上一铺铺藤蔓四下堆放。月色朦胧，他们下到河滩，搬来地瓜蔓，在田垄上垛出三个“隐蔽所”，分别钻了进去，静静地蜷缩在里面。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所以先将钢笔和小本子埋入土中……

当晨曦初露天空放白，日军开始出动。先是飞机轰鸣着低掠而过，马队接踵而至，不成队形地跑向合围点马石山，果不其然没有搜寻村边滩地。惊险的是，透过枝蔓的间隙，李叔瞧见，“有一匹马从我们身边走过，那马还闻了闻刘岳峰盖的那铺地瓜蔓……”

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我读到李叔的文章，依然能感觉到马儿粗重的鼻息，还有透过藤蔓父亲紧张的眼神。枪击、刀刺、火烤，躲藏在山洞里



《先薯亭记》

的一家 8 口被燃烧弹活活烧死——马石山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制造的特大惨案之一，有 500 多个未脱逃者被残忍杀害。

地瓜救了父亲一命。脱离险境的父亲和李叔、荣姨扒出埋藏的小物件，急忙追寻部队，边走边捡拾了几个残留田间的薯块啃嚼充饥。

在山东被百姓们叫作“地瓜”的这种高产农作物，福州称之为番薯。明万历年间长乐商人陈振龙从吕宋（今菲律宾）将其引种回乡，故而名字有了一个“番”。但那传说中绞缠于海船汲水绳秘密带回的藤蔓，如何从闽都盘旋北上，成为山东“地里的瓜”？搜寻查看，竟仍然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

陈振龙带回的薯藤，其子陈经纶试种后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得以在全省推广，为家乡爆发

的饥荒解了燃眉之急。此后这个家族的商业路线似乎北上中原，番薯也随之一路攀行。清康熙初年，陈经纶的曾孙陈以柱由海路抵鄞县，薯秧在浙东抽出绿芽；清乾隆十四年（1749），陈以柱之子陈世元踏进山东半岛的胶州，“子母勾连，如拳如臂”的薯块自此在齐鲁扎根。

胶州，隶属青岛。黄海中部古属胶州的胶州湾，在清代为山东半岛重要的通商良港。善走海路的陈家，可是船行至此？商人陈世元原只为贸易而来，岂料那几年水旱蝗灾频仍，本就地少人多的胶东，饥民更是口粮全无。目睹此情此景，清乾隆十五年（1750）他与同乡余瑞元、刘曦“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之古镇，依法试栽”。种薯行家从福州招募，薯秧亦“闽省乘时采择”，交通不便



陈世元著《金薯传习录》



的当年长途跋涉易干易烂，损耗颇多。他亲自整地育秧、剪蔓扦插，秋季发掘收获丰硕，原本疑虑的乡民们尝到甜头，官员亦多加推广。清乾隆十七年（1752）“各州县奉文劝种”，自此番薯种植在齐鲁大地家传户习，成为不可或缺的粮食品种。福州“番薯”在我的家乡得名“地瓜”，“菁葱郁勃，被野连岗”的地瓜成为百姓主要食品之一，吃法种种，其中“胶东地瓜干”已然成为眼下百度的专有词条。

此后，陈世元与儿子们又陆续将薯藤牵引至河南、河北和北京郊区。清乾隆二十年（1755）冬，陈世元“倦游归闽”。清乾隆五十年（1785）华北遭遇大旱，年逾八十的他本可在有福之州安享晚年，却“自愿携带薯子，契同孙、仆，前往教种”。路途迢迢，因感受风寒，

抵达河南后即病故。陈世元生前著有《金薯传习录》，记载下皮色朱红的薯块繁衍于中华大地的脉络。一门数代，从引种到传播，这个家族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变革，堪称功勋卓越。

胶州建有福州路，不知与早年间抵达此地的闽都客商是否相关？父亲晚年回过山东，在青岛曾寻访儿时就读的学校。红砖校舍依然书声琅琅，几个小学生热心地带领这位老学长参观，令他喜悦不已，回来后屡屡提及。他在腿脚蹒跚不能久站的暮年，说起此生最留恋的欢愉，就是孩童时代与小伙伴们一道玩耍的时光。不知道那些调皮的男孩们有没有跑到福州路？知不知道有一个长乐商人曾经来过？26岁入闽的父亲96岁辞世，一直居住于福州城，安息在文林山，那里林木葱郁，一方方墓碑上镌刻着的逝者籍贯五湖四海，山东山西河南河北……

岁月总在流逝，老家的长辈亲戚亦相继谢世，与北方的来往日渐疏淡，地瓜干时有时无地从胶东千里迢迢而来，更多的只是一种念想。蓝色的先薯亭仍静静伫立，在林木掩映的乌山镌刻着世人永远的感念，于我而言如今更增添了一份亲切。这种神奇的旋花科块茎植物漂洋过海抵达闽都，又从东海之滨攀缘到黄海胶州，曾经在战火硝烟中救下一个八路军普通战士，他生命的藤蔓日后得以结出数个小瓜。瓜瓞绵绵，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代将成为地地道道的福州人，在茶聚中在聊天时，对后人叙说曾经的往事，连同一根神奇的薯藤……

谁的舍人谁的庙

蔡 林

福州地铁一号线由北向南，穿过闽江底盾构施工的隧道扎入南台岛“舍人庙”地界而去，地面上的老舍人庙已垫平在南江滨大道下，而地图上依然留着它的大名。自古因了“舍人庙”而著名的下渡舍人庙道，位于临江路与泛船浦（即“番船浦”，属临江境，旧名上王，明代沿岸辟新港泊番船）“前街”交会处，是当年泛船浦西端

的标志，福州近代史绕不开的地方。

如果把沿江的泛船浦比作一条鱼，那么“舍人庙”就是鱼头，“前街”至海关埕左右是鱼腹，菖蒲墩、港头是划水。当我决意走进“泛船浦”时，鱼头“舍人庙”毫无悬念地占据了主要地位。可是“舍人庙”敬的是什么神，“舍人”又是何方神圣？我一知半解，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这鱼头难啃，我像个自私的孩子，跳过鱼头，从最肥嫩的中段“海关埕”附近下箸，鱼头“舍人庙”留在“后鼎”熥到现在。

1

很愿意从“舍人庙”敬奉的“舍人”为何方神圣说起。

但凡庙宇神社，无论是宗教还是民间信仰，多有主佛或主神。如：大雄宝殿，是敬佛祖释迦牟尼；吕祖宫，敬的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观音阁，则是奉观音娘娘的，如此等等。各地“舍人庙”所敬神主却不尽相同。广东佛山舍人庙供的梁舍人是财神，福州长乐首石山舍人庙供的是秀才，福州屏山龙峰舍人庙则是“霞天洞府金舍人祖殿”……

《辞海·舍人》曰：官名。始见《周礼·地官》。颜师古《汉书·高帝纪》中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东周及汉初王公贵官都有受主人信用的“舍人”，如冯谖、蔺相如、毛遂、李斯……门客谋士们为主尽忠献智的形象接踵而至。

不仅先秦“舍人”活跃。至秦汉时期设置了太子舍人官职，皇后、公主也有属官舍人；隋唐以降有官名“中书舍人”，以抄写文书为要，大文豪苏轼曾任此职。朝代更迭，这一官职地位大小有所变化，冠在“舍人”前的名称也各异，但品阶大多不高，人们常说的“宰相家人七品官”是也。

再聚焦“泛船浦舍人庙”。

据老仓山下渡人介绍，这里供奉的是临水陈太后的儿子舍人哥，敬称舍人爷。临水陈太后乃福州民间女神圣母陈靖姑，这“舍人”是圣母娘娘的血脉。

唐朝大历二年（767），喜好道教祠祀的代宗开始转奉佛教，此时离朝廷遥远的福州仓山下渡降生了一位女婴——陈靖姑。据《仓山志·宗教》载，聪明伶俐的陈靖姑少年拜在闻山徐真人门下，“学法三年，得闻山正法，成为当时著名的道姑，她广收弟子”。与朝廷弃道奉佛不同的是，道教由闽中奇女子领军，在闽地兴盛了起来。

宋时蔡襄两知福州，对福州民众画符念咒、



龙潭角闻山法门及石阶上的陈靖姑像

信巫不信医很是感慨，力主普及医学。然而闽地气候湿热，瘴气弥漫。“闽”字门中虫呀，“虫”的古文字曲笔如昂头蛇，此处本是虫蛇的家园，人类尤其南迁的中原人难以适应。社会落后，医术有限，巫术应运而生，福州民间诸神信仰的四溢，使得蔡知州理想中的医学难以普及。

各类民间神庙鹊起，以陈靖姑信仰为盛，其救灾救难神奇事迹媲美莆田海神妈祖，可谓洋洋大观。传说有一年天大旱，陈靖姑不顾三月怀胎，脱胎儿藏娘家，只身为民祈雨。有长坑鬼伙同白蛇精下毒手吃了陈靖姑的胎儿，并拖住她施法的浮江草席置其于死地。民间《请舍人哥咒语》云：“求助指血弹闾山，法主见血知徒难。拨出四将变四鸭，鸭姆衔席四个角。祈雨救民自献身，廿四羽化保胎神。”相传闽江“鸭姆洲”乃席变是也。感念鸭子功绩，闽中女子月子餐拒食鸭味和鸭蛋。

传说陈靖姑英灵升天之后，向闾山法师迅速补学扶胎救产、保赤佑妇之术。至于被白蛇精吃掉的胎儿，《闽都别记》第八十二回中这般演绎：“陈夫人将毁胎之精气炼度成人，名曰刘聪。即灵通三舍人也。”道教神明“灵通三舍人”分别为：黑舍人包打听、白舍人白感生、银舍人刘聪。陈太后将专司布种人间孩子痘苗的白舍人感生小哥收为谊子，另封“金舍人”。

“殿宇巍峨童得保，人心仰止痘能安。”这是下渡张宝康老师采集到的当年泛船浦舍人庙的楹联，联意正是金舍人感生、银舍人刘聪两童神

的职责，他们皆为圣母之子，佐证了“舍人庙”供奉陈太后之子的民间传说。

牛痘疫苗未出现前，天花病毒堪称非枪炮的“人类种族屠杀”之病毒。民间巫医用痘脓、痘痂感染儿童，使之发病，经照护康复后产生抗体。以毒攻毒，巫医结合，可谓灵验。

这小“舍人庙”威力确实不小。

2

少时我曾对大人口里的“舍人庙”好奇，经过其山墙下大开的门时探头，只见幽暗深邃的大殿地上摆满了电机，阵容不小，那时是“仓山电机厂”厂房。工人们坐在椅子上，将绕好的金灿灿的线圈，用竹片压入电机槽内。除了入口处的亮光强些，里面昏暗，通道尽头有几处光亮，因弥漫着油漆的味道，不敢踏进。

20世纪80年代末，该厂更名为“仓山喷灌电机厂”，与台商合资成立“福州泰瑞电机有限公司”。依然设在幽暗的舍人庙里，登记时门牌是临江路36号。少时女友成了资方代表。我走进它时感觉那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建筑群，依着几个庙堂设了几个车间。

这“舍人”小神庙规模哪能如此这般，它究竟是谁的庙？

细翻《藤山志》，卷二载：“天后宫，大岭顶北麓。附有舍人庙，遂称其地为舍人庙。”得知藤山（仓山旧称）大岭顶北麓临江边有座“天后

宫”。天后宫的主神是妈祖，“舍人庙”附在其中。

为了进一步证实庙宇规模，我将拆迁航拍图发给了女友，并和她一起回忆了楼群的布局。

天后宫里的喷灌电机厂空间井然。从江边北向门入口，第一进是坐南朝北的庙堂，连着左侧偏房是升降机车间，那上面有个二楼，作为厂区托儿所。早年女工只有 54 天产假，有条件的单位设托儿所，为哺乳期母婴提供方便。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产假时间逐步放长，但托儿所仍十分必要。据工人说“舍人哥的偶像早先供在此地”，婴儿托付于此，或许更为放心。这一信息让我大体上可以断定，这车间就是供舍人的神殿，也就是《藤山志》里提到的附设的舍人庙。因最靠近江边，所以那里的道头称为“舍人庙道”。

第二进庙堂是装配车间，另安放机床和喷漆等。再进去是个大殿，左侧走廊连着厂区东向正大门。大殿作为嵌线车间和浸漆车间，正是当年我看到的弥漫着烧焦的油漆味的地方。这是个主殿，采访老员工时，他们多次提到，主梁是整根粗大的楠木。大殿的南边另设有办公楼、电房、仓库等。这个楼群该有五座庙堂，规模不小。

台商入驻时重塑了妈祖、陈靖姑等神像，将北边第一进大殿里留存的舍人哥偶像也请去，两大女神，连同最亲近的舍人一同供在办公楼上。

2005 年南江滨修大道，倒闭多年的工厂清理了老设备后交付拆迁。问女友，舍人安在？答曰：在，离原址不远，退休职工桂官哥在那里做庙祝。2020 年 6 月 29 日那天舍人哥生日，我如

约来到位于原舍人老屋向西约 200 米的江滨榕树下。这是一间铁皮搭盖的小屋，隔江对着中洲岛“航母”，前后牌匾“舍人庙”醒目。周遭与各地迁来的大圣、武圣、闻太师等神庙背靠背、肩并肩地安置着。

炎炎夏日，榕荫下江风习习。见过几位年过耄耋的老工人，整理了闲谈的回忆。得知仓山电机厂于 1955 年从中洲岛搬入舍人庙，工厂基本利用大殿空间生产，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倒闭，建筑都没有大改动，只是早年在修临江路时，东侧大殿的走廊削去了一部分。不少老人与舍人庙有缘，相伴了半个世纪。

当天见面的老者，其中有两个名桂官，一位是木模具大师傅，另一位是铸铁师傅，“木桂”



几位耄耋老人坐在舍人庙前，两位同名桂官，前者号木桂，后者号铁桂

和“铁桂”是区别的昵称。“木桂”回忆：搬入舍人庙那时，他才二十来岁。从小学徒技术很到位，当年月工资达 80 多元，快赶上南下 18 级干部了。“铁桂”夫妇难舍“舍人”，做了铁皮小庙的祝守。工厂里退休的女工有的对舍人始终深信不疑，孩子当年在舍人殿车间二楼托儿所时就开始拜拜，直至上大学、工作、结婚，求平安、求福无不拜拜。其实，舍人早就失业于牛痘疫苗出现之时，民间依然信之，赋予小神更多的保佑之力。舍人拆迁安置江边后，还有不少人来为孩子祈福。于是有道士自荐为道长，在铁皮屋小庙供案正中安置了金（白）舍人感生、银舍人刘聪、黑舍人包打听等小神。妈祖、陈夫人、观世音、太上老君等神仙一位不少的分列左右辅佐，墙上挂着仓山区政府颁发的“守德尊道”牌匾。

当问道，这天后宫厂房内、外观如何，有否保留当年的照片，老人笑曰：谁去保留这些？那些日子职工转岗的、“割头仔”的、忙着找出路的，无暇顾及其他。联系了几个有可能知道的管



从仓前山“往东看”树丛中的舍人庙掠影

理人员，也求助了相关机构，得到不少资讯，依然没有任何直观影像。

3

为还原一个失去的圣殿群落，寄希望觅得当年这庙宇图像，哪怕能瞄上一眼也好。

“心想事成”一点不假，居然真的让我给瞄到了。感谢福州老建筑薛群主从哈佛大学图书馆专门用于收藏与东亚相关文献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 Yenching Library）众多资料里查到“杜德伟相册”中一张从仓前山“向东看”的风景照：树丛中一片庙宇，影影绰绰的壮观从每一个屋脊翘角中透出。我惊喜得不敢相信，心心念念的“舍人庙”倩影居然呈现到了眼前。

接着是 19 世纪 70 年代著名的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森镜头下，闽江泛船浦前街建筑中四坡顶洋建筑和当地民房相间，庙宇的飞檐翘角出没其中。在临江的一丛树冠的衬托下，堵墙门头



天后宫主要庙宇布局



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英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从闽江南岸拍向泛船浦前街

翘角清晰，其下是一抹“跌水”。最前面的大殿侧墙，硬山顶挂瓦保护以及灰塑的如意形悬鱼放大可见。这座庙宇在北门第一进，正是工人说供“舍人偶”的地方。

天后神殿在哪里？从“杜德伟相册”中看到中部那座最大的庙宇，正脊两端的鸱吻拱着中间的宝葫芦，直觉这里供奉天后妈祖甚好。对照平面，此殿正位于工厂东大门处，也就是当年所见的散发着烧焦的油漆味的大殿堂。这道东门该是拜妈祖的信徒的通道。有资料表明，福州五口通商开埠后，泛船浦沿江洋行入驻，在码头和洋行之间碎石铺就一条“前街”，由于其间浦水阻截，东边的人到附近的“妈祖庙”烧香必须绕道南边的“后街”前往，这里附近仅有一座妈祖庙，即为舍人道上的“天后宫”。

更有惊喜，老建筑网上一张由江面向南边拍

泛船浦西头的立面图，画面左边尽头留下这个庙宇建筑群的影子，仔细放大辨认可见墙后飞檐比比。牌堵墙外侧造型传统精致，层层灰塑跌水，吻合了约翰·汤姆森影像露出的“门头牌堵墙”内侧跌水，它的西邻是旗昌洋行，大名高悬，清晰可见，与相近年代地图对照，旗昌洋行的东边正是大片的中国民房。

4

这庙宇建于何时未查到权威记载，民间资料或有矛盾。

《藤山志》载，“宋元以前万寿江南两桥未建，凡去对岸苍霞以上各地的须在上渡呼渡，欲往对岸及南乡一带者须在下渡呼渡”。是为上、下渡，留名至今，民间认为“舍人庙道”即是下

渡主要渡口，这样说来这庙群的年代可推到建万寿桥前。又老一辈人相传，当年站在依山而建的舍人庙、天后宫前，视野可越过中洲岛，直视万寿桥的桥墩，“镇”住桥墩五怪。桥下流水湍急，划船者过桥身上要缠有女子内饰，据说可获圣母娘娘保护。龙舟比赛经过此地，所有男人腰间都缠上女子的内衣，可谓奇观。这么说那应是建在元朝大德七年（1303）开建万寿桥之后。

《闽都别记》第257回，涉及民间记载，此处为“藤山龙脉结聚地”，系临水正神管控的舍人庙，嘉靖年间舍人自发金箭射杀恶稔罪盈之人，故此庙或在明代嘉靖前已建。

明代这块地方沿江水深几十米，可泊大船。明弘治十一年（1498）邓太监来福州督泊，受贿将这块称为“上王”之地租与番人停泊番船。早年有福州人往海外谋生，“娶番妇生子”，多年后，驾着番船顺闽江口上溯回到家乡，驻泊闽江深水道头。明代妈祖信仰在中国沿海以及海外华人中流传甚广。漂洋过海祈求平安当拜妈祖，不仅是民间共识，官方亦然。出海前祈求妈祖保佑风平浪静，上岸后船民先进的也是天后宫。闽江下游入海在即，也许当年行海人为拜海神妈祖而建。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它一定建在五口通商福州开埠之前，否则地图上沿江不会留下中国民房位置，洋人也不能摄下它的倩影。

那么问题是，即然是天后宫，奉的是大神妈祖林默娘，为何此地留名却是小神的“舍人庙”？

地理坐标是影响地名的因素之一。舍人庙建



19世纪末舍人庙（红线圈内中国民房）西边挨着旗昌洋行

在大岭顶未开道之前，仓前山往东的路需从梅坞北端过小路绕道江边，经舍人庙道乘渡船或陆行往东。老百姓走过路过，这个气势独特的建筑群成了地标。说起来太复杂，就以门前第一殿的牌匾“舍人庙”指代，于是门前的道头称为“舍人庙道”。

再者是精神文化因素。此庙中金、银舍人主要是对儿童布痘，在缺医少药的时代，这类巫医与神庙灵验声名鹊起。陈靖姑作为除恶灭灾保平安的当地女神，有一项专职是保佑妇女儿童，福州家庭至今仍有16岁前的孩子拜她为“娘奶”。在其出生修炼之地，民间信仰亦盛。设殿祭拜使之辅佐俩小儿共同护佑人间儿童痘期平安很有必要。海神妈祖影响范围比陈靖姑更广，慈悲为怀的观音菩萨应为主管，各居神殿各尽其职。这样

一来，这舍人庙是以天后、圣母还有诸神为靠山的多层次的神庙集团。

这小鬼当的家，背后这么多大神力挺。随着岁月的冷寂，大神隐退了，小神庙适应了起起落落，与门前的道头结合成这块地域的代名词。

有记载，在万寿桥贯通、大岭顶开道后渡口冷落，香火减少。大岭顶凿路坏了植被，黄泥水流岭下，依岭坡而建的庙群受损破败。

19世纪中叶，舍人庙地块迎来了兴盛时期（洋人镜头中的影像或是此时重修后的舍人庙）。

环球大贸易在中国，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动荡，广州、上海商路受阻。英国人非常喜欢的武夷红茶改由福州港运送更简便，天时地利助推泛船浦。虽然此时，深水港被泥沙淤堵，大船无法从马尾海口上溯泛船浦停泊，然而，廉价的劳动力，将货物化整为零驳运至闽江口，装上出洋的大船，运向海外，逆向反之。凭着蚂蚁搬家的方式，泛船浦以及福州马尾港吞吐了中国50%以上的茶叶贸易，成为世界最大的茶港。西方多国使官、商人、传教士趋之若鹜。从“杜德伟相册”风景照中，依稀可见旗杆外江面上帆樯云集。这夹杂在洋行仓库码头之间的舍人庙道盛况可知。

辛亥革命前后茶叶贸易衰弱，舍人庙道随之冷寂。作为仓山下渡主要渡口，最后的残喘在民国十九年（1930），因万寿桥加宽通汽车，工程在石梁基础上加注混凝土（此时原桥上卸下的石狮子移到乌山图书馆围墙上），很长一段时间禁

行，人货过江回到原来的渡口，靠小汽轮摆渡，舍人庙地块再现车水马龙。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铁蹄践踏下，泛船浦“渔舟傍芦苇”的孤寂正是此时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舍人庙获新生，成了仓山电机厂的厂房，人神和睦近50年。离开老舍人庙工厂的老人们，依然会在大小神生、祭日子相约来到这拆迁安置的小庙。他们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在小神童前高香拜拜。很难想象这一现象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礼毕，老人们平静坦然地谈笑起来，他们身上有福州人恬淡适意的人文底蕴，透着信仰的满足。

如今泛船浦这条大鱼，除位于“划水”部分的菖蒲墩留有“泛船浦教堂”外，中部的“前、后街”、粤华坊、海关埕、老海关路茶厂聚落以及鱼头“舍人庙”等，相继湮灭在社会发展的进程里。谁的舍人谁的庙已不重要，只有文化方可永恒。



泛船浦教堂

花巷到南营

管柏华

从上南街（八一七北路北段）齐项处东折入花巷，大约不到百米拐入石井巷，再走一两个墙门，折向南即是一条长500米的南营街。如此一个曲尺弯，在民俗里却大有典故。福州方言谚语里有“花巷到南营，行当这样行”，张传兴主编的《福州民间文学三集成·谚语》解释为“称办事往往需经一定的程序”。老百姓俗味的解释则更进一步，即从花巷去南营需拐个弯，“亥数”要这样做。

一、花巷故事

花巷在唐朝末年王审知修筑罗城时就有了。《闽都记》说：“花巷名使旌坊，巷以宋李俛任漳郡守，乡人荣之，故名。”古时因有名士蔡奇，又叫“蔡奇巷”，后巷内设“百花务”，又更名为花巷。清末巷内曾办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冰心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她

在回忆录中记载：“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

花巷蕴藏有许多悠远的故事。清朝光绪年间，花巷里有户大家厝，主人褚弦在浙江婺州当知府，娶了一个正妻，是桂省布司的女儿，性颇悍恶，褚弦久有娶妾之志，无奈其妻紧步不离。褚弦瞩目家中一个丫鬟，乘妻回娘家与之私会，丫鬟肚子渐渐大了起来。那主母悄悄将丫鬟叫到上房，审了个明明白白，丫鬟跪地求饶，主母点头应了，却暗暗遣人去岭里瘠地联系一户人家，将带有身孕的丫鬟卖出去。三个月后丫鬟临盆，产一子。坐月子满了，她把丈夫叫到床前说：“你

将此子抱至花巷里褚家，此是褚家骨血，理当完璧奉还，则褚家会致谢酬金，你一定收下。”那岭里丈夫是老实疙瘩，丫鬟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赶到福州敲响褚家大红门门环，果然是褚弦本人接了孩子抱着，又让管家托出漆盘，上摆纹银300两送于乡下人。乡下丈夫正待要走，那主母失声惊叫道：“鬼！鬼！”立刻晕倒在地。原来，乡下丈夫前脚乍走，丫鬟后脚就悬环自尽了，魂魄跟着乡下丈夫到褚家。此后主母也不敢虐待“丫鬟子”，害怕女鬼加害她。孩子长大以后极是乖巧聪明，邻里厝边都叫他“丫鬟子”。民国以后，知府官也没得做了，宦囊中分一部分给丫鬟子分家出去。丫鬟子十分像样地经营了一家中西大药房，衣食无忧，一直活到90多岁。此事被一个写评话的好事者编了一本戏叫《丫鬟子》，上演伊始，轰动爆满。褚弦家族赶紧买断这一剧本，生怕毁了家族声誉。

花巷有座清朝出使琉球国正使赵新的住宅，



花巷

也是三落透后火墙厝。赵新是清朝最后一任出使琉球国使节，之前福州人中有谢杰、齐鲲、林鸿年出使琉球国（其中谢杰为副使，其他为正使）。出使琉球一般在每年夏至出发，要待到冬至才能利用季候风回来。因为路途太过艰险，所以要备好棺材。棺材上钉着银牌，上面镌某年某月某国的来使名字，一旦遇到凶噩便躺进其中，由人钉好棺盖推入海里。据说这么做是防止死后葬身鱼腹。花巷尾有座陈钦铭故居。陈钦铭与赵新一样，也曾做过外事工作，其在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后，首任即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来才历官上海道、江苏按察使等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即是陈钦铭的姑婆嬷（按：陈帙为陈氏浙江苍南入闽始祖陈高13世后裔，陈钦铭是16世后裔）。据文史专家李厚威说：“陈钦铭无子，死后房产由侄儿们继承，后代多在国外，花巷老宅许多的房产都捐献给了‘尚友堂’。”不知是否属实。2001年福州西二环巴黎之家小区工地出土陈钦铭墓碑（《少希陈君神道碑》），现存放市博物馆院墙边，碑文由一品大员清户部尚书翁同龢书丹。

二、岁月悠悠南营街

在石井巷中段苏公井旁折向南则是一条与上南街平行的南营街，街长几乎与西边的上南街相等。南营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笔直，即从南营尾可一眼看到南营口抚院前的菩萨龛。



南营巷



南营巷内景



石井巷

南营历史悠久，《榕城考古略》载：“钓鲈桥折而北，为南营，古驻泊营地。宋时将卒自他所调集者居此，有横冲营、百胜营、捉生营，环坊隅以居。”是以宋代就作为驻军营地，因地近南门，故称南营，以别南门兜西侧的西营里。古人称“南营多名士”，其实是说读书仕宦者居多。地方文献里说：南宋朱熹避“伪学乱”时，曾寓居南营。此事被记载于《朝仕陈氏谱》书中，并说朱熹曾书“宾月楼”三个大字于嵩山（今丁戊山）北麓某座楼。此事言之凿凿，也许朱老夫子就是那时在闽县播下了福州读书人的种子。

南营 20 号大院（一说 19 号），原是罗丰禄故居。罗丰禄父名罗治宗，曾任千总。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开办船政学堂时，罗丰禄应招入学堂任教习，又在驾驶班学习驾驶船舰。后留学英

国，归国后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为僚属，后随李鸿章赴英、德、法、美访问。在柏林访问时，德国宰相俾斯麦对罗丰禄赞赏不迭，送他一帧亲手签名的相片。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使英国并兼任意大利、比利时三国公使，算得上精通洋务的显宦。

永泰人力钧，清朝御医官，光绪朝十二太医之一，南营有他的居所。力钧幼年跟随刘善读书，刘善医儒兼修，正是福州人俗呼的“新衫”，力钧因此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有一年，力钧得疟疾，医生误诊为瘟病，给他服用“白虎散”，寒热更甚。后来有个叫朱若春的乞丐治好了他的病，还指点他如何区分疟疾和瘟病。光绪十五年（1889），力钧中举人。隔五年，力钧赴东南亚游学，开始中西医结合临床。因常给达官贵人治

病，名噪京华。民间传说力钧曾为光绪皇帝笔书，光绪皇帝病情大有好转，慈禧因此不满。力钧惧祸，急流勇退，以血置于盆盂，假称肺病呕血，因此瞒过内监以盛年致仕回闽。

陈培锟生于1877年，1898年经殿试钦点翰林，他是历经清朝、北洋政府、民国、共和国的“四开高干”，其所以一帆风顺，与他的个人修为是分不开的。陈培锟最爱的“吾家之千里之驹”陈心榕原是省商业厅食糖站秘书科职员，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是家父的秘书和挚友。心榕叔亲口给我讲过其祖父、父亲钦点翰林的故事。陈培锟家早年住在南营，家庭贫寒。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想进京会试，其父让他去鳌峰坊外祖高家要些盘缠，结果，外祖父说：“女婿香雪学力虽不咋样，但孙子韵珊却是跨灶之才。”就给了陈培锟一些银子。陈培锟把钱交给父亲陈香雪。陈香雪笑嘻嘻地对儿子说：“你这么年轻，还是给我再去考一次吧！”陈培锟年纪虽轻，但很有上进心，他说：“不行，这钱是外公给我的。”陈香雪捻须笑道：“那你再去向外公要，我们一起进京赶考吧。”外公最疼爱他，想想父子进京一路上也有个照应，所以又把钱给了陈培锟。陈培锟一路小跑着回了朱紫坊家里，半路上还滑倒，跌入安泰河的河湾里。父子俩进京后双双上了翰林榜单。陈培锟后来担任清朝的浙西巡按，名声很好。民国时当过临时省长。有一年，陈培锟过生日，请了许显时等多名省府大员，结果6位大员被土匪卢兴邦绑票，陈培锟却安然无恙。显然，

卢兴邦也是害怕得罪福建省的读书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培锟被任命为省文史馆首任馆长。1963年春节，我随家父去心榕叔在南营附近的家，中午吃饭时，陈培锟从后房慢慢地踱出来，还摸着我的头，慈祥地问我学习的事呢。

三、梦断香台里

梁鸿志原住在南营街香台里。香台里是一条浅窄的盲肠巷，只有几户人家。

梁鸿志生于1882年，从小就很聪明，但功夫往往不用在正道上。他曾在亲戚家相中一幅唐朝阎立本的画，贱价买入，转手以30万的高价倒卖到日本岩崎，然后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1905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民国后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成为安福系骨干，任执政府秘书长。段倒台后，闲居津、大、沪、杭等地，因藏得36件宋朝古物，号称“三十六宋斋主”。抗战爆发后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后与汪精卫勾结，先后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立法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处死刑。梁鸿志从小熟读经史，长于诗文，为人狂傲，以苏东坡自许，著有《爰居阁诗集》十卷。梁鸿志善相。抗战中，某次，梁与一些汉奸在杭州孤山楼外楼饮酒。席间，梁鸿志称座中黄秋岳“君必不免”。举座大惊，良久，有人问：“那你呢？”梁嘿然低语道：“吾亦不免。”后果然应验。

梁鸿志生长在世代冠盖簪缨之家，他的曾祖父是晚清重臣巨儒梁章钜。史书上称梁章钜曾先后住在三坊七巷以及距南营不远的灯笼巷，香台里的住宅是否属于梁家，或可存疑，只是梁去今不远，不太可能张冠李戴。

香台里的巷口处，住着一户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黄市长黄骏霖，他曾是福州民建主委，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其祖父就是有名的闽商大佬、义序人黄占鳌。黄骏霖成天提着个上海产提包，牵着一部八成新的28寸自行车出进。他气质儒雅，长得像福州俗话说的“大头大脸”，慈眉善目，为人处世，与同住一弄的梁鸿志简直是忠奸立辨。在网上查到一篇他任职福建师院时的学生写的回忆文章，说他在中文系讲古典文学，如何学富五车，循循善诱。黄市长育有两女一子，邻居说儿子名叫依母，曾在福州大学当老师。

香台里3号的陈海瀛也是清白做人，守着读书人的本分。他是清光绪年间举人，曾留学日本，北伐前夕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后为福建省法政学堂教员，福建省文史馆馆员。

四、塔影楼里著书立说

塔影楼在南营塔崎顶，去塔崎顶需经过有多层台阶的七转弯弄。塔影楼在大觉寺旁，建于宋代，可惜如今已经废圮。陆游曾在福州任决曹，其在《老学庵笔记》中记录塔影趣事。这座楼的左边木板有一条裂开的缝隙，太阳升到正中的时

候，缝隙中会倒映出整座塔，可见营造者设计的精妙绝伦。

明朝崇祯年间，《福建通志》（康熙志）的作者郑开极家居塔崎顶。他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隔四年连捷中进士，并被选为康熙皇帝玄烨的伴读，又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八年（1669）顾命大臣鳌拜被捕，同一年，郑开极典试云南，任满后，即乞假告归。郑开极直到三藩之靖南王耿精忠乱平后才回福州定居。从此，他居家二十载，闭门谢客，以“操存主静，主动戒躁”为座右铭，埋头于《福建通志》的编撰。郑开极于志书成后，一度出任浙江学政。康熙五十二年（1713），适为玄烨60岁万寿节，此时郑开极已进入古稀之年，他不畏舟车劳顿，赴京祝寿，受康熙赏新衣一套，松花石砚一方。郑开极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魂归道山。其曾孙郑际熙乾隆三十四年（1769）中进士，也算是克绍箕裘，功德圆满了。

鳌峰坊高家，即前头说的执闽士牛耳的陈培锟母舅家。高向瀛的《郁离岁纪》载：“先世明季由山东入闽，先居长乐南乡，旋徙省垣……传闻始迁时居城内南营嵩山之麓……”这说明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的祖上，曾在嵩山即今之丁戊山麓住过。如《水浒传》五十五回里说的“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亦说明钟鸣鼎食的高家在福州最早是起家于南营旺地的。

今人谢其铨《丁戊山小志·跋》云：“嵩山钟灵毓秀，代出名人雅士，宋有刑部尚书王若

愚，明有丁戊山人傅汝舟，清代《福建通志》主编郑开极，两江总督梁章钜，四川总督王庆云及其孙状元王仁堪，可谓地灵人杰。”

五、寻常巷陌

南营位于旧城中心，北有左通衢的东街，南接安泰河城中内河枢纽以及抚院前，东有被称为“嵩岳”的塔崎顶大觉寺，西有“前街买蛏”的上南街，前照后靠，极尽地利之便。至今还能从福州民国私塾课本《五言杂字》中读到这样的文



军门社区织缎巷口

字：“龟鳌螺蛤蚶，留仔蠔共替（海蜇），锁广虾米干，带鱼蛎与蛎……”殊不知这些琳琅满目的海产品当年都存放在从厂巷到南营的仓库中。

《福州坊巷志·卷二》记：“浣衣所用刷子，以棕或豕鬃扎竹为之。晚近巷中有一家营此，所制最佳，人呼‘南营衣裳刷’。”又“福州俗，殓殡所用靴帽有以布与纸黏成者，甚简陋，贫者用之。其帽呼‘水帽’。其市集向在军门前一带，今津泰路之西也。”

花巷口的花生糕店，在品兰香条丝烟肉绒店附近。民国时期这家店的花生糕分两种，一是纯花生制作，一是花生没炒过，任凭顾客选择。肉绒原创于光禄坊林鼎鼎，其在油酥这道工序文火细酥的窍门，城内大家厝多好这一口。因福州地处亚热带，人家多食粥，肉绒成为绝佳“粥配”。花巷品兰香条丝烟最先效法光禄坊鼎日有，质量与鼎日有肉绒媲美。说到“粥配”，花巷口常聚酱园店的“五香包香干”也算热销珍品，吃素的佛教人士买得最多。其特点是原料黄豆采用富含蛋白质的品种，软糯紧实，越嚼越香。南营王东子的父亲设酱园店于城守前旁的大根路，以机器生产包块香干，并以大墙根为招牌，引来顾客无数。南营依姨橄榄店，早年在上南街连接津泰路口开鲜水果店，其所卖绛蜜桃、荔枝等质量上乘，并在城南包果树，生意做得很实在。后经营橄榄蜜饯，其丈夫人称“橄榄伯”，性喜泡温泉，为人豪爽大气。

南营医寓海济和尚，浙江余杭人，俗姓曾，

名文樵（1888—1978）。12岁时随其父出家福州鼓山涌泉寺，后在林阳寺任方丈。精中医，尤擅长血症，对妇女崩漏有独特疗法，也会看肺病，个子很高，说得一口杭州口音的普通话。当地人都叫他“和尚医生”，曾带一徒弟，也有人称是螟蛉一子，老百姓都叫他“和尚悌”，医德医术都很好。当地还有一位接地气的卢姓医生开医寓于此，其子卢亚，曾是厦大学生会主席，为人颇豁达。

旧时福州人称鼓楼人为“城里人”，说是讲话轻声细语，妇女走路轻手轻脚、斯斯文文，称呼自己为“奴”，不像城外一些贩夫走卒，大嗓门，称自己为“老歲”。举南营一个“绣和尚”赖德森为俗呼“城里人”的例子。赖德森是南营中军后人，少年时学刺绣，因父母觉得他命中带煞，为祈求消灾降福而叫名和尚。他是评话三杰的前辈，人称“三总管”之一。据已故文史专家陈竹曦回忆录称：“绣和尚”博而精，自编自演，唱白俱佳，书路很广。有两件事说明他的艺德。一是帮“科题仔”黄仲梅成名。早年，赖德森曾经向“科题仔”父亲黄菊亭学习讲《蔡松坡打倒袁世凯》，黄菊亭死后，黄仲梅从格致中学辍学，生活没着落。赖德森就拉他一把，鼓励他扬长避短（长于说表，短于吟唱），另辟蹊径，又将黄菊亭的《蔡松坡打倒袁世凯》回头教给他，并特地把他带上台和自己对口。以后“科题仔”成为福州评话“前三杰”，一代“讲报大师”。第二件事情，他在贤南河边开一家“和乐轩”评话馆，

会书时让听众自由观摩，每次馆中开书，他都到场压阵，并以此地作为切磋评话艺术的场所，他常说：“臭棋也有神仙步，哪个名艺人不是从无名小辈做起的！”

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明清以来的南营，可以说是科举的渊薮。林家钟《梅园随笔》记录，南营附近就有嵩山杨礼舆夫子书塾和石井巷朱荫庭书塾，其他在中军后诸地设帐讲学者不计其数。嵩山书院、石井书院更是如雷贯耳，名震三山。孟超然住南营中军后，主持鳌峰书院8年之久，培养出梁章钜、陈寿祺、林则徐等经世致用之才无数。孟超然以翰林院大儒身份，严以律己。某闽南富豪以罪入狱，愿出银10万两。某日宴会上，有人稍露意图试探，孟超然则慢慢起身，踱了几步，回身仰天叹道：“难道我近来有什么丑行被诸位发现？为什么这类语言会传到我的耳中？”举座大惊。孟超然经营的鳌峰书院，以诚治校，学生激增，校舍不纳，最后只得数人一屋。

南营居委会曾是军门社区的前身，当地人说，它是福州的小营巷（在杭州，毛主席曾视察过，当时的主任也曾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而林丹更是抱定为人民服务宗旨，数十年如一日，成为南营人爱戴的“小巷总理”。朱熹在福建尤溪文庙曾有诗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清以来“驸马脚下，抚院门前”的南营拥有“天、地、人”三利，前程将更加灿烂美好。

福州中山堂的前世今生

岫 云

北宋龙图阁学士创建贡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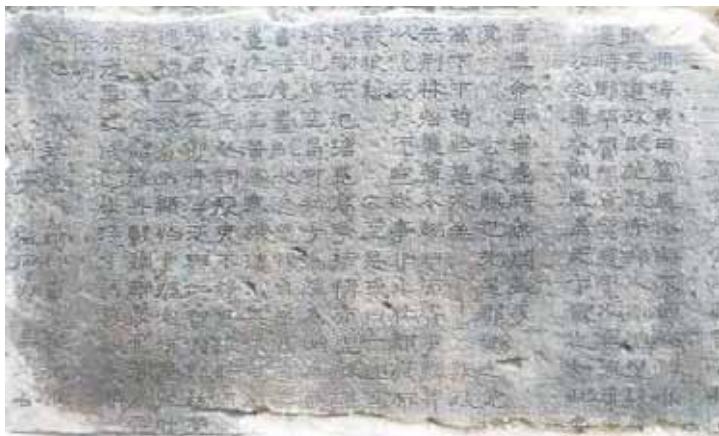
福州湖东路北侧，深藏在高楼大厦间的中山路，全长400米左右，路尽头孙中山先生手持拐杖、身着风衣的铜立像背后是一座灰白砖石外墙

的两层建筑——福州中山纪念堂，其前身为福州贡院。据考究，这一带唐代时建有马球场，相传面积相当于现在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现只留有一块残碑。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柯述创建福州贡院。今中山路人行道边立有一座“福州贡院”雕



福州中山纪念堂



唐代马球场现只留有一块残碑

刻墙。贡院是科举时代士子考试的场所，我国现存四大知名古贡院：江南贡院（南京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北京贡院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河北定州贡院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9），川北道贡院（四川贡院、阆中贡院）始建于道光十二年（1822），但它们都不及福州贡院悠久古老。

柯述是宋龙图阁学士。北宋“龙图阁学士”虽属荣誉称号，但至少与此相关：一是受封之人乃某一领域学识渊博之人，二是此人曾受皇室青睐。如包拯、苏轼、范仲淹、刘昉等人均领过龙图阁职衔。柯述（1017-1111），字仲常，闽南泉州人。宋嘉祐四年（1059）进士。曾任湖南转运使、广东经略安抚使等职，后以左朝议大夫，直龙图阁，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出仕50载，绵延五朝。

柯述一生懿行、操守、官箴极佳，被苏东坡、郑侠等人赞为“古循吏”。柯述在担任漳州

施赈副使时，处理赈务公平合理，饥民颂德。传说有一对喜鹊长期栖息在柯述办公的官署厅堂檐下，当柯述调任要离开漳州时，这对喜鹊依依不舍、一路相伴，久久不愿离去，“漳人异焉”。苏东坡遂为其写《异鹊并叙》长诗，以褒扬之。宋神宗十分器重他，赞其族“真瑞鹊堂”，于是，柯氏一族遂以“瑞鹊堂”及“瑞鹊传芳”为号，衍传至今。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福州水患，灾情严重，朝廷派柯述权知福州兼福建提刑。平治水患后，柯述利用自己在皇帝面前的话语权，着手创办福州贡院，从此改写了福建科举的历史。《八闽通志》卷之六十七称：“（柯述）元祐、元符中两知福州，旧无贡院……述择州治东南公廨及废地为院，构地百二十区，士林称便。福州之有贡院自述始。去后，人怀其德，祀之学宫。”

泉州、漳州、福州三地皆将柯述奉于学宫或祠内，“士类德之，配祀于学宫”。泉州文庙旁

特立祠纪念；福州先贤堂，先祀陈襄、郑穆、刘彝、周希孟、陈烈，后追加陈祥道、刘康夫、郑侠、柯述和常袞，合称“十先生”。

南宋这里曾经是垂拱殿。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破南宋国都临安（杭州），恭帝赵㬎及太后被俘虏，恭帝兄赵昰当年五月一日在这里登基，称端宗皇帝，改年号“景炎”。不到半年，元兵向福州进攻，闽府尹王刚中开城门投降，端宗皇帝赵昰跑到林浦行宫，从海路逃往广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布政使薛大昉将之改建于城南谯楼（俗称鼓楼）之东。明成化七年（1471），布政使朱英又回迁改建至治山东北方（现此地）。明正德十一年（1516），巡按御使胡文静嫌文场前面太过逼近小巷，遂“令有司购民居八十区辟之，东西各八丈，南倍之，更为正门南出”。正德十四年（1519），又重建了诸堂、寝、廨舍、楼台等建筑。

明万历五年（1577）春，贡院毁于火。翌年重建，中为至公堂，后为衡鉴堂、抡才堂、主考官房。中为洗心亭，东西为五经考官房。外东为监临公所，西为提调监试公署。东有“对读”“受卷”“弥封”“内供给”四所，西有“眷录”“巡绰”二所；至公堂前东西文场（试场），中明远楼，西隅瞭望楼。大门前有“天开文运”坊，两旁各“明经取士”“为国求贤”坊。东为三司公署，西为外供给所，中有登瀛桥。又有坊曰“天衢”“云路”“龙门”，达于通衢大道。据史料载，用能工巧匠日达数千百人，“计诸什费，帑金七千缗有奇”。

清康熙十九年（1680）重修，三十八年（1699）、四十四年（1705）、五十六年（1717）先后增辟文场。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御赐“旁求俊义”匾额和御书楹联，联曰：“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与贤共天位，勗哉多士，观国立光。”乾隆十八年（1753）增建堂舍、



中山路上“福州贡院”雕刻墙

增高墙垣、筑夹道、疏通沟渠。改“龙门”坊于二门内，移“天开文运”坊于旧龙门地，改署“为国求贤明经取士”坊。旧“为国求贤”坊，改为“云路”坊。道光六年（1826）重修，东西民房益广号舍千余间，撤旧砖百而新之，增拓高广，公署堂所悉加增拓。

清道光七年（1827），因贡院木构部分渐趋腐烂而重建，称为“至公堂”，主楼五开间，两翼各三开间，它是中国官方公用建筑，建造技术却是西方的。主楼的罗马式浮拱、透空的两层会堂，都属于西式建筑。其建筑材料包括砖、木和石材，使用了洋灰等西方技术。屋顶仍是中式的，每条屋脊上各有7只脊兽，这表明了福州此类建筑中当时它的等级是最高的。国人最早以西式技术建造的官方建筑，说是1913年建成的成都辛亥秋保路纪念碑。按照这个标准，福州贡院“至公堂”道光七年（1827）修建，年代更早。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年代，秀才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场所往往是热闹之处。福建有很多历史名人在此贡院中举，如民族英雄林则徐、楹联大师梁章钜、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还有李光地、赵新、曾宗彦等。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更是1893年全省乡试第一名的举人，也就是当年的“解元”。

福州贡院也是闽台关系、两岸科举文化同根同源的历史见证。清康熙帝平定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台湾府，受福建省当局的统一安排，台湾士子秀才中举必须来福州“至公

堂”贡院参加乡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凤山县（今高雄）的举子苏羲第一个在福州贡院举行的乡试中考中举人，成为开台举人。据统计，从1687年至1894年的207年间，台湾考生在福建乡试中考取举人的有305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开台第一进士”的郑用锡。

清乾隆版《福州府志》序言有称：“闽中选举，前代无闻。登进士科，则自唐始，至宋称极盛矣。”福州贡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底蕴深厚，福建参加科举并中举的人数空前增多，在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福州中山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结束长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兴办新学、提倡立宪。为准备立宪，宣统元年（1909）九月初一各省除新疆外统一成立具有地方议会形式的谘议局。福建谘议局设址原贡院“衡鉴堂”和“至公堂”。福建光复后，该局成为过渡时期的议会。

民国元年（1912）4月1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促成南北统一，辞去临时大总统，到各省游历。他应福建省都督府政务院电邀莅闽，4月19日傍晚乘坐“泰顺”轮到马尾船政局，20日到仓山桥南公益社、南门左侧明伦堂出席福建国民协会和福州各界代表的欢迎会，同时慰问黄花岗死难烈士遗属，然后前往贡院埕、福建省谘议局。

福建各界在至公堂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先生在会上演说，“现在我们虽已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并表示黄花岗 20 多位闽籍烈士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竟之志。当天，孙中山先生与福建省都督府军政官员、省市各界欢迎群众在至公堂前合影。民国二十一年（1932）为纪念孙中山莅临，福建省府将至公堂改名为中山堂，作为国民党福州党部所在地，并将南面的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

1950 年中山堂为“中苏友协”办公所在地，抗美援朝时期为“和平大会”办公所在地。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因舅公家在中山路 8 号，笔者常去暂住几天。70 年代前，附近的丽文坊口

一道门栏，有士兵站岗守卫，里面是福州军区后勤大院，据说于 1956 年入驻，中山堂是军人办公厅。1971 年后，部队搬走，中山堂成为省商业局（厅）的办公场地。90 年代，商业局（厅）建新大楼，中山堂成为商业厅囤放物资的一个仓库，1997 年已是奄奄一息的危房了。

1998 年的一天，曾是民革福州中山职专学校成员的父亲苏孝桢告诉我，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批复民革福建省委负责修复和管理福州中山堂，先后拨款 300 万元。2000 年前后笔者看见陆续有工人进进出出。据说中山堂 2001 年落架大修。修复过程中发现保存下来的灰色旧墙砖面上刻有“道光七年”字样，证实至公堂已有 170 多年历史。本着“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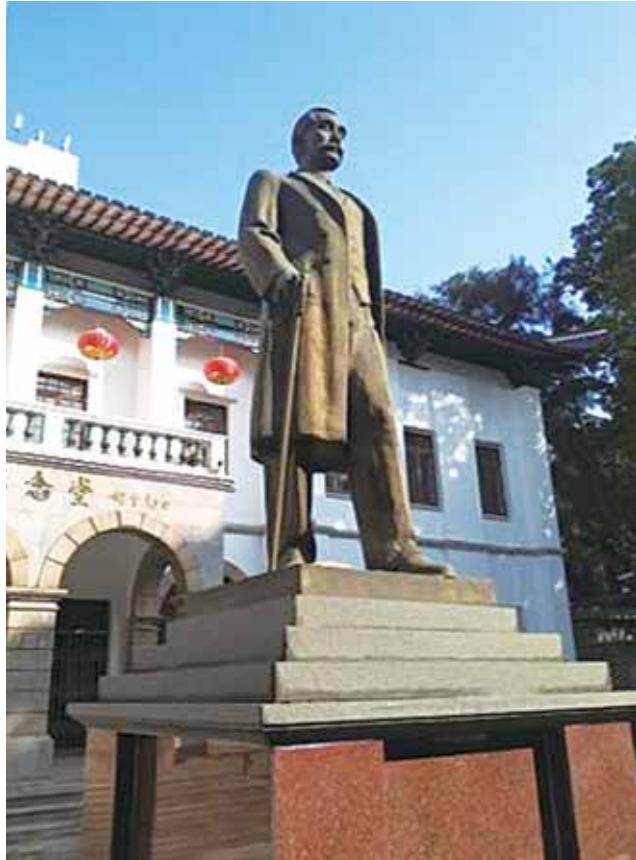


中山路



福州中山堂石碑





中山纪念堂前的孙中山像

中山堂终于恢复了原貌。

福建全省民革党员捐资浇铸了两尊孙中山先生铜像，分别安放在中山堂内外供人瞻仰。礼堂内的孙中山半身铜像高1.34米、宽0.76米，代表铜像制作时间是孙中山134周年诞辰、逝世76周年；堂外正门前竖立一尊孙中山先生手持拄杖远视的全身塑像，座顶部阶梯状，座高2.1米，铜像高2米，寓意20世纪伟人站在21世纪台阶上展望未来。

2002年省政府批准福州中山堂由民革福建省

委员会管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亲笔题写了“福州中山纪念堂”7个大字。2002年6月21日，福州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和“孙中山与福建民主革命展览”，何鲁丽开馆剪彩。

在展厅里，有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博爱”墨宝，老同盟会员王兆培捐赠的祖传的藏宝，1928年塑造的孙中山铜像。这尊铜像是根据一位意大利工匠于1926年打制的孙中山小铜像进行倒模的，同样由南京晨光机械厂制作，当时全国仅此一尊。还有同盟会福建分会总干事林斯琛当年用过的木笔筒等。

2004年3月，孙中山嫡长孙、香港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孙治平和基金会主席陈守仁，率团拜谒福州中山纪念堂。孙治平出生于祖父孙中山访问福州的1912年，他92岁有幸到祖父曾经演讲过的福州中山堂，觉得特别高兴和欣慰，算是了却一桩心愿。就在当年，孙治平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2008年，全国孙中山和宋庆龄纪念地馆际交流首次在福州中山堂举行，台湾孙中山纪念馆也派人前来参加。2011年10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统战部，民革福建省委等5家单位在中山堂震天的锣鼓声中联合举行福建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邮票首发式暨集邮展览。福州中山堂以一次次的交流与活动的方式，弘扬孙中山革命精神，推进扩展海峡两岸和平交往，并以其生动的史迹，默默地向人们讲述它的前世今生。

一条巷子的传奇

唐 冈

在龙岩新罗区，我被一句活灵活现的民谣所吸引，这句民谣是“一巷三尚书，转头便侍郎”。说的是明代从一条巷子里走出过三位尚书，还有好几位侍郎。这条巷子叫作石埕巷，顾名思义是石板铺砌的巷道，当是旧时龙岩城内大家士族以及官宦居住的地方。

于是，在当地文友的引领下，我来到位于老城区的石埕巷。岁月流逝，巷子两旁的房子早已面目全非，但弯而窄的巷道，沿坡势迤逦起伏，依然可以想见昔时的街巷规制，让人浮想联翩。

古老的石埕巷见证了龙岩城区的变迁。据何乔远编撰的《闽书》记载，龙岩（唐开元二十四年即736年设新罗县，6年后更名龙岩县）建城之初是以编竹为栅，后来才改为土墙，但非常简陋。当时城内只有军营和衙门。到了宋代，才出现城堡的雏形，而且有了街道和居民。元代，经过几次修筑和扩建，城池渐具规模，还开凿了护

城河。明代洪武年间，根据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的既定国策，福建各地均加大了筑城步伐。沿海自不必说，地处闽西南的龙岩也不甘落后，一次修建了6座城门。此后，龙岩城曾频遭兵火，尤其是邓茂七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龙岩县城后，城内官邸民居多在战乱中损毁。此后，龙岩城墙不断增高增厚，护城河也挖大挖深，成为闽西南一处坚城。

因为有了高大的城池，相对有了安全的依靠，一些大户人家相继进入城内并修建宅邸，聚族而居。一条石埕巷也随着两旁宅院的兴起而不断延伸。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诏天下各郡县全部设立学堂，各县设教谕1人，训导2人，学生20人。学生必须研习经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科。自洪武三年（1370）八月开始，朝廷举行科举考试选士。朱元璋在诏书中



这样说道，唐宋时的科举，只求文辞华丽，元朝多看中家中权势。而本朝开科取士，应试者必须经学深湛，品行端正，博古通今。也就是品学兼优者。他更规定，凡应试选中者，将由他在朝堂上当面策问，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之人，一律不得封官。

由于皇帝的提倡，全国学风大盛，而且学子们懂得不仅要注重学问，还要注重人品。龙岩的读书风气，也越来越浓厚。尤以一条石埕巷，课读之声不绝于耳，常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有元一代，龙岩没有出过一个进士。明永乐二年（1404）王源第一个打破进士荒，当报喜的捷报由快马传到山城，街巷一片沸腾。这一喜讯给了龙岩士子们很大的鼓舞。这之后的明清两代，地处东南一隅的龙岩一县进士竟达到40多人。其中，石应岳1571年中进士，三年后蔡梦说登进士榜。1604年，王命璇再拾荣耀。

王源、石应岳、王命璇和蔡梦说在当时被称为龙岩“四衙”。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誉，不仅因为他们官做得大，而且做得正，得到老百姓的好

评。“四衙”中，有三位出自石埕巷，他们是石应岳、王命璇和蔡梦说。此外，石埕巷的名士还有王尚贤、柯元伯、王思沂等人。于是，民间便有了“一巷三尚书，回头便侍郎”的歌谣。乍一听，似乎是在称赞这条巷子里达官贵人云集的盛况，及至我在《龙岩县志》里读到他们的事迹，才明白这句歌谣里真正的含义。

石应岳是石埕巷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因为文采好，人品出众，殿试后便被留在中书省任秘书。不久进入礼部，很快又擢升，执掌户部，多有政绩。他不仅是一位能官，更是一位清官。他一生担任过两地要职：应天府尹（南京市市长）和顺天府尹（北京市市长），在任应天府尹期间，与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的海瑞性情相投、交往甚密，两人联手，不畏权贵，严惩贪官污吏，使得当时南京官场呈现一片清明景象。南京人争相流传民谣：“总宪（海瑞）清如水，京兆（石应岳）白如霜。”石应岳晚年辞官归隐家乡，从不显耀其曾担任过朝廷要职的经历。县志记载，在家乡，石应岳依然“为政于家，为德于

乡”，为乡亲做了很多好事。为官数十年，谢世时，一室清风，家财“仅有图书”，乡间野老甚至不知其为公卿。及至下葬时，朝廷派参议闵梦得前来祭拜，礼仪十分隆重，并宣旨赠“户部尚书”，这下，石埕巷的乡亲们才知道，这位平易近人的退休老人，在朝中的地位曾经多高。

蔡梦说也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廉官。他担任过监御史，敢于直言进谏，还因此被罢官回乡闲居18年。重新被朝廷启用后，他初心不改，依然倔强如故。他以御史之身，先后巡按江南、广东。巡按江南时，曾弹劾西陵侯籍田千余亩；在安徽主持修筑铜陵大堤，人称蔡公堤。巡按广东时，他主持建造潮州城石梁，以御水患。当地人立生祠纪念他，与韩愈、陆贽的祠并列，称韩山三祠。据说，蔡梦说离开广东时，广东百姓相告痛哭。等到出发那一天，整条江上的船只都将缆绳缠绕，致使蔡梦说的座船不能前进。其得民心如此。黄道周曾著文这样描述过他，说蔡梦说回乡隐居已经多年了，他的名声德望在岭南依然被叫得很响。当地百姓如果听说有从漳州一带过来的，一定会问起龙岩（当时属漳州府）的蔡公。潮州人甚至在挖井上梁时嘴里也要念叨着蔡公的名字，蔡梦说成了当地百姓的保护神。

而王命璇呢，担任过广东、陕西多地大员，宦海沉浮几十载，始终忧国忧民，秉公办事。他不怕得罪朝廷重臣杨嗣昌以至崇祯皇帝，坚决查办监军太监邓希诏的失职案件，为此退休还乡。而在饥荒之年，他甚至冒被杀头的风险，打开国

库粮仓，赈济灾民。

16世纪中叶，正值欧洲殖民者“航海大发现”时期，葡萄牙人的航船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我国东南沿海。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由，通过向明朝地方官员行贿，获准在澳门半岛暂时驻留，之后迅速聚集成村，并设立管理机构，图谋长期霸占澳门。时任广东巡抚的王命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下令增设澳门参将处，作为管理澳门地区防务的军事机构，奏请朝廷批准并选拔智勇双全的军官担任参将，征调能征善战的“西山之兵”防守澳门。他还颁布命令，规定外国船只除在指定日期可以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外，其余时间一律不得靠岸。同时他还根据广东沿海的地形，周密设置炮台和防兵。王命璇主政广东五年多，为巩固国家海防殚精竭虑，席不暇暖，让觊觎我国东南海疆的荷兰、葡萄牙人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

1653年春，王命璇在龙岩万安圆光寺中去世。他生前曾立下遗嘱：头不顶清朝天，口不食清朝粮，脚不踏清朝地。出殡时，觉慧禅师将其棺木用铁棍撑起，置于岩洞中，以遂其志。

石应岳、蔡梦说和王命璇，虽同为宦海中人，却都一个秉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畏强势、硬骨铮铮。

一句歌谣，在龙岩传诵500年，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就是百姓的口碑。它根植在人们的心中，世世代代，风雨不移。一条石埕巷，也因此书写了一段传奇。

茶商“何同泰”生死劫

郑 芳

同其他民族工商业一样，福州茶商“何同泰”的快速发展并未持续太久，战乱成为企业发展的劫难。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何同泰”的灾难由此开始。这一时期，“何同泰”运往沈家门的大批花茶被日寇没收。沈家门位于浙江舟山，素有“小上海”“活水码头”之称，常年万船穿梭。自明代开始，沈家门便是通航日本、朝鲜的重要港口，也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埠。

1937年，“何同泰”碰上的另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被中国茶叶公司压制。当时，私商出口的茶叶都需要经过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的批准。掌握此权力的实际上是时任办事处副主任的尤柳门。尤柳门的办事原则是看钱行事。而当年受战事影响，茶叶出口运输困难，福州茶商业奄奄一息，为争取茶叶出口非得贿赂不可。外来的“京帮”如“正兴德”“泉祥”等号都因走这条捷径而得到特许，福州茶商如“何同泰”等，因为没有向其行贿，茶叶一直没法出口。好在“何同泰”老板何培閔颇多社会关系，他把中

茶公司福建办事处操纵茶叶出口的内幕写成小册子，托人转给时任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的林森，再由林森转给孔祥熙，之后孔祥熙吩咐中茶公司通知福建办事处准许私商运出一批茶叶。可见当时福州茶商的生存环境之恶劣，也足以看出何培閔的社会影响力。由此，福州茶叶出口取得了突破。

迫于战乱，1940年后，“何同泰”生意停顿，股东解体。有一段时间，何培閔蛰居上海，对颓败的家业一筹莫展。

1941年4月，福州第一次沦陷，何培閔的名字被日本人列入福州市商会会长候选名单。何培閔借故推托，隐居了20多天，之后，商会会长改由他人任职，何培閔则迅速出走上海，但在此期间，“何同泰”厂内的货物却被日本人搬空。

抗战后期，海运稍通，何同泰制茶厂准备东山再起，恢复经营。不幸的是，1944年10月，福州再次沦陷。何培閔拒绝日寇委以福州市维持会会长的任职。据说，那天，包括何培閔在内的福州商会会员都被召集到位于旧桥头的邮电局大



福州仓山观音井邮局旧址（福州二次沦陷后，何培閭曾在此处婉拒维持会会长的任命）

楼二楼，当场推选何培閭做维持会会长，何便以茶厂事情多、需要回来商量为由婉拒。对于何培閭的这一举动，抗战胜利后，时任福州市市长的黄曾越曾大加赞赏。之后，何培閭及其家人迁往南港避难，重兴“何同泰”的计划搁浅。

原本，何培閭以为在异地仍能掌控茶厂的发展。但现实并未如想象的那样。他离开后，“何同泰”茶厂及何家的私人财产全部被日寇及社会闲杂人员洗劫一空。据何培閭之子何翔宇回忆，何

家于1945年抗战胜利回到福州时，“何同泰”已满目残败，连屋顶的瓦片也没剩几块，屋内的地板也全被撬走。

抗战胜利后，何培閭试图东山再起的想法遭到了何家上下的反对。因为对当时的何家来说，战乱中“何同泰”遭受的是近乎灭顶的打击，要重新振作谈何容易，无疑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但性情刚烈的何培閭从来是说到做到。

1946年，何培閭从台湾引进了全套制茶机械，建成了当时全国除台湾省外仅有的一一个比较完整的茶叶精制机械化茶厂。这一举措给“何同泰”茶厂带来了一线生机。它改变了过去花茶生产纯手工操作的历史，对日后推动福建茶叶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的茶叶市场并不景气。福州的许多茶厂陆续倒闭，但“何同泰”茶厂不但没有倒闭，而且还扩建了机械加工车间，其原因除了质量保证外，主要是信息灵通，与上海、天津、台北的茶商联系及时，产品转向和调动迅速，反应快。据说，当时的“何同泰”为了不泄露商业信息，各地之间发送电报都采用密码，收到后再按原先议定的密码意思翻译。

此外，“何同泰”比其他茶厂多了运输上的便利。何培閭是个相当懂得利用社会关系的人。当年，福州没有铁路运输，公路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大宗茶叶若从海上民运出省，多有拦劫事件发生。当得知福州有位国民党海军司令，此人手头上有艘退役的旧军船做货运，何培閭便争取与



1947年，位于仓山浦顶的何家新洋房建成不久，何培閭和家人的合影

其在海运上合作，以保证茶叶运输安全便捷、如期抵达。

“何同泰”实际上已成为当时茶叶行业的老大，影响着茶叶的价格、等级及工艺标准。在天津，北方茶商常常在新茶上市前来打探“何同泰”的茶叶行情，而在福州，不少同行也会打听“何同泰”给花农的价格，以此掌握产销信息。

1947年后，“何同泰”的生产经营又迎来了新高潮，全国各主要市场业务活跃，连新疆客户也远道而来，向“何同泰”订购花茶。何培閭的弟弟何高政驻香港主持的转口外销业务也已铺开。

曾任教于安徽省农学院的茶专家庄晚芳先生



1950年的何培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第一届政府颁给何培閭的聘书

对“何同泰”的花茶深有好感，通过何培閭的侄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在一所大学求学时认识的何翔明介绍，到福州何同泰茶厂拜访何培閭。交谈中，何培閭提及花茶生产的很多做法及相关资料，对庄先生日后充实教材，标新科研项目都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1950年夏天，福建省科研管理机构曾派人进驻何同泰茶厂，深入车间了解制茶流程，收集数据，制定产品规格，作为规范行业标准的参考依据。国内几个主要市场的订单纷至沓来，这让“何同泰”的生产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1951年，何培閭以福州市茶叶界代表名义赴上海参加华东区物资交流会，紧接着，又以华东区贸易代表团代表（福建省仅两个名额，另一位为当时福州工商界名人倪松茂先生）的身份，再次应邀赴天津参加华北区物资交流会。

1949—1952年，何培閭被推选为福州市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委员。

1954—1956年，“何同泰”接受中茶公司福州



摄于 1959 年，何培阁与三个儿子在福州

茶厂的加工订货任务，茶厂稳步发展。1954 年，何同泰茶厂的固定员工增至 188 人。

1956 年，公私合营，“何同泰”解体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并入福州茶厂（位于仓山区埔顶），成为福州茶厂的第三车间。何培阁被聘为茶厂技术股副股长，直至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车间劳动。同时，何同泰茶厂的部分资金转入筹建福州文艺影剧院，何高政、杨鸣銮和部分茶厂职工转业进入影剧院工作，何高政任影剧院经理。何同泰茶厂的另一部分资金则划入福州蜡纸厂。何同泰茶厂的历史由此画上句号。

“文革”期间，何培阁受到冲击。1971 年弥留之际，这位曾在商场上风云半生的人，仍然希望“何同泰”字号能重出江湖。

2017 年夏天，我和何培阁之子何翔宇先生重访何同泰茶厂旧址，旧物旧景已经全无影踪。“从前的六一路很窄，只是条小路，曾经的老宅在这边，茶厂就在小路的斜对面，就是现在（埔顶）小区的位置。茶厂很大，另一侧可以沿着基



何同泰茶庄曾使用的信封

督教小岭堂旁边的小路上来……”站在如今六一南路 130 号福建中移通信技术工程公司的门口，年近八十的何先生还能清晰描述当年的老宅，以及父亲何培阁工作的点点滴滴。曾由何培阁从上海带回设计图纸，于 1947 年建成的那座花园洋房，早已夷为平地。何翔宇先生和弟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老宅旁边修建的一座两层半的楼房，已被拆了大半，剩下临街的一层，成了店铺。

幼年时常跟随父亲去茶厂的何翔宇，虽然成年后从未从事和茶叶相关的工作，但曾经的耳濡目染，让他掌握了一手制作茉莉花茶的手艺。每年，他都会按照父亲制定的标准，选料、窨花、制茶，只做几十斤，除了自己喝，也馈赠一些给父亲曾经的搭档杨鸣銮的家人，以及喝惯了“何同泰”花茶的亲友。

有幸每年都会收到一罐何先生制作的花茶，那一杯朴素的茶汤凝结的是岁月的花香与茶味。某次问起“何同泰”花茶的工艺秘方，何先生回复，“做茶先做人，人对了，茶差不到哪儿去。”

国药行咸康参号记

江梦笔

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的日子，在福州上下杭隆平路与下杭路交接口，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店铺悬灯系彩，大摆筵席，鼓乐齐欢，人潮朝此聚集。酒过三巡，一只披红挂彩的活鹿被牵了出来，一番祷告，就地立斩，新鲜的鹿血汩汩而出，剔出鹿茸鹿尾鹿角鹿筋，或泡酒或用以炼制全鹿丸，各尽其用，以示药材正宗。

铺张吸睛的大戏过后，沸腾的人群渐渐散去，围观的众人记住了这家大肆喧闹的药行——咸康参号，一栋美国佐治亚风格的建筑。神殿廊柱门楼两侧凿空设立两扇大玻璃橱窗，被杀前的那头鹿便陈列于其中一面，橱窗旁仍张贴着“溢鹿制药”的剧情告示，另一面则是鹿身之百宝或各类名贵滋补品，诸如秘制的周公百岁酒、虎骨木瓜酒、各类饮片等。

据《双杭老铺》记载，咸康参行的老板张桂荣（1892—1950）出生于闽侯上街，年少时曾在福州南街“大生春药房”当过学徒，精通丸、散、



下杭路咸康参号旧址

丹、膏及饮片的制造技术，20岁便自立门户，在上杭路开设“张乾泰中药材批发栈”，后来因代销日本“太极参”获利，在隆平路又开设了“华大

医药商店”。两家店铺开张，为日后创办“咸康参号”奠定了基础。1935年初，咸康参号原老板经营不善，低价转让店面，张桂荣、张桂丹两兄弟以23000枚银圆盘下了占地2800平方米的咸康药店的店面和房产。原先的“张乾泰中药材批发栈”和“华大医药商店”两处店址便作为仓库与员工宿舍。当年的国药行分为号、栈、店，其中以“号”的资金实力最为雄厚，咸康参行便以“栈”兼“店”的形式进行经营。

据《福州双杭志》记载，从清中期发展至民国时期，上下杭地区的国药业已有40多家。隆平路处于街区中心，是当时唯一一条贯穿了上杭路与下杭路的主线，短短几百米就有数家大户国药行。当时咸康参号的对面是德发京果行，朝着隆平路一路过去有元昌药行、广芝林药行、隆平药行，药行与药行，凛凛对峙，相视无语。现场宰杀活鹿兜售滋补药材、门口拴猴招揽顾客、车上装着橄榄盐沿街赠送给市民等，都是当时大药行常见的营销宣传手段与戏码。据记载，当时四省药店的老板设计了店徽与统一的工作服，还曾聘请一名印度人专门在店门口站岗，迎送进进出出的顾客。在经营特色上，各药店都有各自主打的拿手丸散丹药，大药行开设了夜间卖药、函购代邮等便民措施，代客煎药与送药上门的服务更是常见，煎好的药汤由店员装入保温瓶，坐上药行配备的轿车，亲自送到病人家中。

当时处于丁字路口的咸康参号，把持着这一行当的流量，隆平路和下杭路上肥肥瘦瘦的人

流，都要从咸康参行处撕开的那道口子处，流进流出。然而要在激烈的药行竞争中脱颖而出，则更要“内外兼修”。

与多进院落的国药行不同，咸康参行是典型民国式建筑。正立面大门上赫然“咸康参号”招牌，四个大字遒劲雄强，气势恢宏，足以咸康参号提气鼓劲。配上九赤金箔所贴的对联“咸宁资上药；康乐晋同胞”，醒目耀眼。外部青灰砖墙，西式柱式护着大门，门的两侧拱形窗洞内绘制金属莲花图案，再过去的两边为毛石砌筑的通高方柱，往上，中开落地窗颇具气势，将二三楼巧妙地连成一体，二三楼左右小窗玲珑，各开各的。自古药铺布局多考究，多为“前店后厂”式，咸康内部布局大抵相同，一层大厅，后设仓库和宿舍，大厅南侧左右各有楼梯，二三楼为办公区域，中部镂空，三面通廊，三楼顶着一个玻璃天，露台可晒药。往里走，室内面积大而宽敞，地铺进口花砖，水墨石的地上镶铜条，在货架、窗门等细微处可见精雕着花鸟走兽与人物故事，装饰讲究。

一家药行如此精雕细琢，又富活力，广告声势铺天盖地，无法不夺人眼球。药行来客多是憔悴病态或频繁问询，但药行良好的环境与周到的服务总能拂去来客的几分焦躁。坐堂医生望闻问切，提笔出方，一张咸康参号医店特有的处方便递到柜台。柜台是长长栏柜，生人勿近，一旁的客人尽可享用店内的楠木茶几茶椅，安心等待。

当时上下杭分布着许多福州最好的中医诊

所，但诊所与药行的功能是分开的，行医与抓药是两套各自运行的系统。于是一些大户国药行便聘请名医坐诊，而这些药行也研发了秘制的药丸配方，为避免药方外泄，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处方语言。

接下的活便交给药房的“掌盘使”，由他全盘运筹，各个岗位上都有人员各司其职，账务账房先生管理、名贵药材的调配由细货司执掌。抓药也是一项具观赏性、戏剧性的细活，粗对药方，镇尺压上，铺麻纸，持戥子，抓药材，齐眉对戥，药品与戥盘轻触即离，忽升忽降，如行文的抑扬顿挫，动作行云流水，行业的讲究细在微妙间。若需参茸珍品，细货司便用上象牙箸夹，去精细的货架，取下锦盒、红绸锦缎里的药材。这些算是药材与用具的惺惺相惜。后头一排排抽屉组成的药斗墙是中草药大江湖，各种净选切制的中药饮片、配方用的炮制中药和各种丸散等品类近千种。药屉多是用锃亮黄铜的拉手，性相近的药材紧密挨着，习相近也不阻碍。称好药后，要请另一位师傅按药方核对，确认无误才可包上虎头包，系上活扣，递给客人，道声“慢走”，其情殷殷。这都是祖宗留下的老规矩。一直以来，药行都视“药架生尘”为它的真性情。

在咸康参考药包的包装纸上清晰可见店名、地址、经营内容、古训理念等，这是它的独特宣传。店内的药材采购入库都由库房管栈按品级细分。至于独家研制的散剂，这些成药、药酒遵古法炮制，秘而不宣，为避免有人抄袭处方跳槽，



咸康参行宣传单

甚至连一张处方都由几个人分工完成。丸药的研制程序也十分严谨，由指定的丸散司、研槽司共同制作，饮片切割由加工处的四类刀司负责，刀司还可细分为正副刀司，每一道工序，都需老板亲自过秤，以防有员工从中偷工减料。这些细节看似烦琐，实则环环相扣，全指着药行发展的要害和气数。

在丸散的经营上，咸康参行自制提炼了许多品种，对各类丸散配方进行整理归类，编成《丸散全集》，封面便赫然标着地址和电话，序言里提出行医的古训与初衷。压轴处附上了林森、萨镇冰等名流的题字。在宣传造势与药行发展的有机关系上，老板颇具前瞻性。据《解放前南台的国药行业》一文记载，咸康药行还花重金在当时的报纸和电话簿上打广告，内容如“咸康平安散，除疳去积，儿童圣药”“咸康国药行拔济霜，具有杀虫止痒除湿拔毒之效力”等，药行所生产的



咸康参行编《丸散全集》

眼药膏远销省内外及南洋等地。

当时各个药行的地域分工十分细致，咸康药行客源以永泰、闽清为主，批发经营范围辐射闽江上下游与邻县，它依靠着优质的药材、专业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和雄厚的资金脱颖而出，鼎盛时期药行员工达 70 多位，跻身当时的福州四大药店之列，与回春、四省、华来齐名。民国二十四年（1935）成立的“闽侯县中药商业同业公会”中，第五任理事长便是咸康的张桂丹。此外，咸康还在航运便利、靠近第一码头的台江设分行，方便药材搬运和业务往来，与此处构成襟带衣连的呼应。在运营上，方式灵活，资金流动快速，由设在香港的“福成泰”庄代办进出口一类业务，而设在上海的“华记商行”一面作为川、陕、甘、赣、浙及东北各地地道药材的集中采购点，一面以物易物，用福建土特产茶收回参、茸、羚羊犀牛角、麝香、燕窝、珍珠等高档药材，形成产业链。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由水路运输至妈祖道头，再由工人运到药行的仓库，

这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条隆平路。

20世纪40年代，上下杭的许多商铺面临着诸多考验与变局，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国药行却顺利地经历福州沦陷、金融危机、福州解放等历史事件。1956年公私合营后，咸康的家族成员和员工被分配到药业和其他行业工作，药店原址成为福州医药站第三经营部，后又改作药品公司的仓库，再后来，为某印刷厂所用。2013年，咸康药行与上下杭其他三家民国老商号建筑作为“上下杭商号建筑群”被列为第八批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当初“溢鹿制药”的热闹场景，到药品锱铢必较的讲究，再到“但愿世间人无恙，宁可架上药生尘”的初衷，让人看到的是社会演进中这一行当的一面镜像与文化蕴含。

如今它仍然站在路口，在曾经繁华的背景衬托下，更促人在幽深的感受中回味着那段明火煮药、切制饮片的时光，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一丝中药般苦涩的味道。

宋代：闽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赵麟斌

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预言“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宋儒专言义理，是为宋学。从广义上看，宋学则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之总称，它涵盖了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反映在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力图在社会改革上体现经世致用之学。历史上宋学思想对闽都文化的发展影响尤为深远。正是在宋学价值观的引导下，独具特色的闽都文化在宋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并从地域文化走向了中华主流文化。

一、成为儒学重镇

在宋代，具有鲜明特性的闽都文化首开闽学之先河，承续南传义理之学，社会习儒成风，福州成为儒学闽学学派的重镇。明代著名学者黄仲昭云：“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可以不愧于邹鲁矣。”

闽学萌芽于北宋，至南宋由朱熹集大成，之后在元明清继续兴盛并扩大影响，由地域性上升为全国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福建被誉为“理学之乡”，作为闽学先驱的“海滨四先生”（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功不可没。他们是闽都倡导宋学、义理之学的前辈，



鼓山上的摩崖题刻“进无所苟，退无所愧，惟义所在”，出自陈襄



文儒坊

开启闽中学术界经世致用之新风气。陈襄（1017-1080），北宋理学家、“海滨四先生”之首，福州一代儒士典范，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福州闽侯人，宋枢密院直学士兼侍读、判尚书都省。身为北宋名臣的陈襄，以其实绩为闽中的理学推广做出了不少贡献，堪称闽中地区提倡理学的早期重要代表之一。周希孟（约1013-1054），字公辟，福州闽侯人，宋国子监四门助教。郑穆（1018-1092），字闳中，福州人，历任宋岐王、嘉王侍讲，拜国子祭酒。福州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因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陈烈（1012-1087），字季慈，号存古，称季甫先生，福州长乐人，宋太学博士。清代李清馥所著《闽中理学渊源考》专辟一卷为《海滨先生学派》，对海滨四先生的理学倡道之功做了客观评价：“海滨四先生者，忠文陈公襄、助教周公希孟、祭酒郑公宏中、教授陈公季慈，同时倡学于闽者也，闽自唐欧阳四门开人文之先，海滨四

先生继之。先哲尝述宋初安定、徂徕、泰山三先生倡学于周程未起之先，功不可忘。若四先生在闽倡学于杨、罗、李、朱未起之日，功亦岂可没哉？”闽学在福州的发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批以弘扬闽学为己任的福州籍理学家，仅就南宋而言，据《福州府志》记载，有名可考的人物就有陈宋霖、黄榦、刘砥、刘砺、刘玠、林谟、潘炳、陈孔硕等33人。

陈襄考中进士之前，在家乡福建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讲学，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情，增进了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并且一起身体力行。他们坚持弘扬儒家之道，获得了当地一般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遂共同构成学术团体“闽中四先生”，逐渐声名远播并在学术史上留下深远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以陈襄为主的闽中四先生“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精研五经，明礼重义，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

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对闽学的发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襄著有《古灵集》25卷等；陈烈著有《孝报经》3卷等；郑穆，“性醇谨好学，读书至忘栉沐，进退容止必以礼，门人数千”；周希孟，“通《五经》，尤邃于《易》”。海滨四先生坚守儒家孔孟之道并为之讲学不辍，逐渐开启了新的儒学传统。蔡襄任福州太守时，专门聘请他们执经讲学，课徒授业。据载，陈襄弟子达1000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700多人，从陈烈学习者亦常数百人。南宋年间，福州百姓在乌石山上建造专祠奉祀“海滨四先生”。

宋代福州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大批儒学名人云集闽都，所以儒学最为发达。会聚福州的知名文人学士有李纲、张元幹、朱熹、陆游等。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先生，常州无锡人，祖籍福建邵武。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善诗文，写有不少爱国篇章。亦能词，其咏史之作，形象鲜明生动，风格沉雄劲健。著有《梁溪先生文集》《靖康传信录》《梁溪词》。张元幹（1091—1161），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晚年自称芦川老隐。芦川永福（今福建永泰嵩口镇月洲村）人。历任太学上舍生、陈留县丞。张元幹与张孝祥一起号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朱熹（1130—1200），行五十二，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江南

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著名诗人。创作的诗歌今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等。

福州宋代历任知州中，多有文化名儒和一代文豪，如张伯玉、蔡襄、赵汝愚、辛弃疾、曾巩、黄裳等，他们主政福州任上，对闽都浓郁的习儒文化氛围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张伯玉（1003—1068），字公达，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人。北宋天圣二年（1024）登进士第。以后又登书判拔萃科。伯玉兴学育才，做出很大成绩。治平二年（1065），伯玉移知福州，即令编户浚沟七尺，植榕绿化。数年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伯玉植榕声名盛极一时，所以福州别名榕城。伯玉多学而博识，文章为曾巩叹服。他嗜酒善诗，有“张百杯”“张百篇”之号。官终检校司封郎中。著有《蓬莱诗》2卷，已佚。至今在福州西门外的西河公园还立有张伯玉的塑像。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北宋名臣，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天圣八年（1030），蔡襄登进士第，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为官正直，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在福州时，去民间蛊害；所著



西河公园张伯玉塑像

《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而《荔枝谱》则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其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传世。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南宋名臣、学者，南宋宗室。宋孝宗崩逝后，赵汝愚策划实施“绍熙内禅”，奉嘉王赵扩（宋宁宗）即位。以功升任右相，与留正同心辅政。赵汝愚学务实用，常以司马光、范仲淹等自许。著有《忠定集》15卷等。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

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黄裳（1044—1130），字晟仲，人称演山先生，福建南平人士。元丰五年（1082）考取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北宋词人文学家，著有《演山先生文集》《演山词》等。

二、文化教育繁荣

宋代，闽都文化达到鼎盛时期，教育也进入繁荣阶段。办学、讲学空前兴盛，官学普遍设立，书院大量涌现，学塾、家塾、义学、书社、乡学广布各地。福州城出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

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前后三次倡导兴办州学、县学，因此官学遍于郡县。南宋时期，随着西外、南外宗正司移驻福州、泉州，两地皆设宗学，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南宋时，福建1府、5州、2军、58县全面建学，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福州地区州县之学尤为兴盛，位列八闽之首，成为“儒学最盛之地”。福州共计办州县学14所，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学于一城，规

模庞大，养士最多。此外，宋代福建各地家塾、义斋、乡学、书社等各种私立学校遍及各地。据《淳熙三山志》记载，福州“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北宋崇宁年间，福州州学生员达到1200多人。南宋理学家朱熹对福州学堂盛赞有加：“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

南宋时期，地方办学以书院为主，且民办的居多。宋代福州新建和修复了27所书院，其中12所创办人不详，其余15所有6所是官员修建的，6所是理学家修建的，3所是民间修建的。

书院是儒者共同研究学问与授受儒学的场所，宋代福州书院比唐、五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与“闽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书院创建者或讲学者多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故而宋代福州书院也就成为理学思想传播的重地。如创建拙斋书院的林之奇，字少颖，侯官人。曾从名儒“大东莱”吕本中学习，后吕本中之侄孙“小东莱”吕祖谦入闽，师从林之奇，就在拙斋书院从学。据《宋元学案·紫微学案》记载，当时林之奇门下弟子达数百人。而创建栗山草堂的林宪卿，创建龙峰书院的刘砥、刘砺兄弟，创建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的黄榦，创建鳌峰精舍的潘炳、杨复、陈宓，创建龙门精舍的林学蒙，均为朱熹的高徒。即使创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几所书院，也与闽学有密切关系。如螺峰书院，据载，“朱晦翁与黄勉斋讲学于此”，而魁龙书院则与朱熹在古田的弟子林择、林扩之兄弟有关，朱熹曾在此

讲学。创建于北宋的福清龙江学院，到南宋也相继有莆田林光朝和福清王莘、林亦之、陈藻等名儒先后在此讲学。在南宋，福州从事书院教育的闽学学者中，黄榦可谓佼佼者。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是朱熹的高徒和女婿，从学朱熹前后达26年之久，是朱子门人中最有成就的教育家。清人蒋垣说：“朱门受业最多、最知名者黄榦……而黄榦门人最多。”黄榦在福州、汉阳、建阳等地创建的书院有6所，并先后在10所书院、6所官办儒学授课，仅在福州，他就创建了云谷书楼和高峰书院，并在栗山草堂、鳌峰精舍、闽县县学，以及于山、乌山等地的民居、寺庙讲过学。黄榦的弟子，仅福州及邻府邑的就有200多人。黄榦在福州书院的教学实践，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教学内容涉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以及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黄榦除了将朱熹考亭书院成功的教学经验，如崇祀学派先贤、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知行结合等方法引入福州书院外，还着重强调学者以立志为先，认为“学道如登山”，不可“半途而遂废”，教导弟子应“循序而渐进，自强而不息”。

朱熹在福州的讲学和办学活动，对福州书院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朱熹十次来榕讲学，曾在福州的三山书院、濂江书院和竹林书院等书院讲过学。据《榕城考古略》等地方文献记载，朱熹于“避伪学禁”期间，到福州亲自创办或协助创办了福州紫阳讲堂、福州竹林书院、福州贤



濂江书院



紫阳社区“讲堂胜境”

场书院、福州高峰书院、福州濂江书院、亭江龙津书院、长乐龙峰书院、罗源文公书院、闽县吟翠书院、连江丹阳书院、闽清梅溪书院等。福州紫阳讲堂在今晋安区王庄街道的紫阳村大桥自然村。朱熹曾称“紫阳先生”，为纪念朱熹在该地办学，称该地为“紫阳”。紫阳村里现在保留一座古建筑，称“讲堂胜境”，地名“讲堂前”。濂江书院创建于宋朝年间，迄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书院坐落于福州林浦古村内，这是福州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朱熹讲学的古书院。南宋年间，朱熹侨寓建阳，云游福建各地，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其间，朱熹及其弟子曾来濂江书院讲学，他对这里的学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题词“文明气象”赞扬这里的师生。朱子的品德思想为书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濂江书院因此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其中以林浦林氏一家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最为出名。

整个宋代，福建产生了5900多名进士，约为宋代进士总数的1/60，其中有多人考中状元。南宋时，人们将“福建出秀才”看作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作为八闽首府的福州科名非常兴盛，仅仅是在两宋时期就走出了文武状元共21位，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至淳熙八年（1181）的202年间，以科目进者共计1339人，从建中靖国（1101）到淳熙九年（1182），在这82年里就有1037人，居全省之冠，成为我国出状元最多的城市之一。

福州在宋代曾出现“三科三状元”“六子科甲”“五子登科”“一榜三鼎甲”等科举奇迹。南宋乾道二年（1166）至八年（1172），福州府所辖永福县（现为永泰县）七年三科三状元；据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载，南宋乾道年间，永福县令曾赋诗云：“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家山亦状哉！相去未逾二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在

唐朝举子赴京会试时皆须投状，因此称居首者为状头，元即一，故有状元之称。按照颁布公布的惯例，该榜名均以本科状元的姓名命名，这就是“三科三状元”，他们分别是：乾道二年（1166）丙戌科萧国梁榜，乾道五年（1169）己丑科郑侨榜，乾道八年（1172）壬辰科黄定榜。这是以七年中连中“一县三状元”而创造出全国唯一的进士文化纪录。

“六子科甲”：福州螺洲陈承裘有七子，除第五子夭折外，剩下六个皆登科第，其中三个举人、三个进士，长子陈宝琛为清末重臣，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成进士。

“五子登科”：宋皇祐五年（1053）福州永泰人张肩孟登进士后，其五子相继登科，五子同朝，俱为显宦，清正廉洁，时有“丹桂五枝芳”之语，流传至今。

“一榜三鼎甲”：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福州府侯官郑自诚高中状元，福清林德兴荣登榜眼、侯官黄桂再获探花，一榜三鼎甲，全属福州人。

宋代福州兴盛的科举文化留下了不少有关状元的地名和掌故。

五一中路“状元境”。北宋时，福州第一位状元许将（1037-1111）曾在现福州市水部街道的地方居住。因许将文武双全，廉洁奉公，深受宋神宗和宋哲宗的器重，曾担任明州通判、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等职，后人为了纪念许将，将他居住之地命名为“状元境”。

于山“状元峰”。于山护国禅院后的状元峰，相传因宋代陈诚之在此读书，绍兴年间（1131-1162）考中状元而得名。上有宋淳化元年（990）吕文仲的题名石刻。明代学者杨应韶在此题刻“状元峰”三字。旧时峰顶有状元亭，久已废圮，今为瞭望台。

晋安新店“状元岭”登山古道。福州有四条省际古道，分别是福温、福瓯、福莆、福延。福温古道为福州经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至温州的大道，是古代福州学子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状元岭古道是福温古道的遗存，起于新店的象峰村，止于宦溪镇，全长3.6公里，是宋嘉祐三年（1058）怀安知县樊纪募资牵头，由人工在峻岭间开凿而成。民谣有“北岭石阶三千三，阿爹挑担忙下山；出门月色照山路，回家日头早落山”，极言其行路之难。

此外，永泰樟城镇建有“三元祠”。宋乾道（1165-1173）间，永泰县的萧国梁、郑侨、黄定3位学人，连续三科考中状元，轰动一时，于是后人建了一座三元祠以为纪念。连江透堡镇岭兜村还有个“状元井”。宋淳熙元年（1174），该村郑鉴进太学，获两优释褐状元，后建“状元井”纪念。

宋代的闽都文化极大地传承了宋学思想，开闽学之先河，呈现鼎盛之势，从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林庚白与孙中山

林 怡

林庚白（1897—1941），福州螺洲人，原名学衡，字浚南，后更名庚白，又自号众难、忏慧、摩登和尚等。他出身于“八世科甲”之家。这个家族从清初康熙朝到光绪朝末代科举结束，连绵八世有子弟高中举人或进士，甚至出过影响着乾嘉年间福州士风士气的林雨化——林则徐极其敬重的宗亲师长。

林庚白六七岁能诗，在福州有“神童”之誉，得到硕儒名士陈衍、何振岱等人的揄扬，福州文坛的耆老名儒谢章铤，闻此而爱才心切，已近84岁高龄，特地差人买了礼物，专门派人送给这位天才神童。林“神童”不负其名，宣统元年（1909）13岁，虚报年龄18岁，竟然以第一名成绩考进了京师大学堂预科。

受林雨化等家族先贤影响，林庚白少小便有做“超人”的英雄心志。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十四五岁的林庚白以翩翩年少，书生意气，由同学孙炳文（孙维世的父亲）介绍，得以结识同盟会会员赵铁桥，经赵铁桥介绍，纳交于其时



林庚白

正激进反清的汪精卫，并由汪精卫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汪精卫、孙炳文、梁漱溟等人在天津创设了京津同盟会，呼应南方的武昌起义。从此以后，林庚白成为孙中山等人的得力干将，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马前卒。著名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众难早慧逸才，十余岁即奔走国事。”此后30多年，在北京、福州、广州、云南、武汉、上海、南京、杭州、重庆、香港等地，都活跃着林庚白儒雅而传奇的身姿。林庚白一生进取，他反对腐朽的清廷，反对袁世凯称

帝，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清剿”。他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盛赞延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坚韧不拔。他呼吁坚决抵抗日本入侵，为此不惜与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等人绝交。他毕生为中国民主共和伟业而进取、奋斗，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寇宪兵射杀在香港九龙天文台道路口，壮烈殉国。

林庚白一边革命，一边钟情于文学创作。他的革命激情洋溢在他飞扬的文采中。凭其“神童”的功力，他在京师大学堂内标榜古典诗词，14岁就与名盖京华的同乡前辈陈衍等人结诗社，敲诗钟，相唱和。15岁，由陈子范和林之夏介绍，结识柳亚子，加入“南社”，成为“南社”诗坛的健将。他以擅长古典诗词而名噪一时，自称其反映现实的诗文创作已超越杜甫和郑孝胥，但他并不排斥白话文学的兴起。他办刊办报，讲学著述，积极创作白话语体诗文，写下不少缠绵悱恻的白话诗歌、小说等，并提出反映现实民生疾



林庚白手稿《人鉴》

苦的文艺主张。

林庚白还精于命理之学，有民国第一“神算”之称，著有《人鉴》一书，一时洛阳纸贵，名噪上海滩。但他郑重撰文，否认自己有占卜算命的怪异才能，说不过是聊以此道排遣对国民革命失望的情绪，并希图借此激发民气，反对袁世凯称帝，诅咒袁氏不得善终而已。

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先生整理编辑了林庚白的诗文集，结集为《丽白楼遗集》（上下卷），收录与孙中山相关联的诗歌主要如下：

即席赠中山先生并示汉民诸子

尝胆卧薪事可思，万方重见汉官仪。
策勋已定平陈略，努力毋忘在莒时。
稍喜民权今有主，大难国病孰能医。
同舟共济群公在，更向先生乞导师。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林庚白这首诗应写于孙中山就职之后不久，他和孙中



《丽白楼遗集》（上下卷），林庚白著，周永珍编

山、胡汉民等同席庆祝，对中国的“民权”建设充满期待，并期盼国民党人能够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此时林庚白才 16 岁。南京政府成立后，汪精卫推荐林庚白给居正履（时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务部次长），林庚白担任了一个月的内务部参事，此诗当写于他履职之际。孙中山年长林庚白 30 多岁，林庚白对孙中山充满由衷的敬意，将孙中山视作引领自己革命的导师。

这时，年少的林庚白自称“对于官吏的生活，不感着兴趣，也还因了恋爱关系，跑回福建去办党”。他在内务部参事任上只待了一个多月，便在 1912 年春末离开南京，他有诗歌《春尽日出金陵》云：“转眼兵戈纷万变，疚心党籍要重编。竭来阅尽中原事，每过金陵一惘然。”诗中隐约反映出他对孙中山去职、袁世凯当轴后时局的担忧。

事实上，1 月 28 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孙中山率领各行政官员莅会，并亲致祝词，但南北和谈已在进行中。2 月 12 日，清帝逊位。2 月 14 日，孙中山亲临参议院辞大总统职务。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职。而早在 3 月 10 日，袁世凯已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少年林庚白的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也真是超凡脱俗。1913 年 3 月，宋教仁被暗杀，林庚白在诗歌《哭遁初》中写道：“已危国事凭谁挽，未死人心有不平”“芳菲乱眼春无主，政变寒心死倘休。”

针对宋教仁被杀事件，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

讨袁，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7 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但 9 月即宣告失败。11 月 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党员的国会议员资格，孙中山流亡东京。1916 年 6 月 6 日，称帝的袁世凯终于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于 7 月底 8 月初恢复国会，孙中山回到上海。

1917 年 1 月，黎元洪在北京重新召集国会，林庚白被推举出任国会众议院秘书长。6 月 12 日，段祺瑞为首的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7 月 1 日，张勋拥戴溥仪复辟。7 月 4 日，孙中山与程璧光、唐绍仪等商议迎接黎元洪来上海设立政府并发表讨逆宣言。7 月 17 日，孙中山抵达广州，筹组护法政府；7 月 21 日，海军司令程璧光率舰南下，支持孙中山护法。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政局中，1917 年 8 月，林庚白与其堂兄林炎南分别携国会印章、枢密文件和巨款等，秘密离开北京，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护法。由于程璧光和林庚白兄弟的鼎力相助，8 月 27 日，国会非常会议得以在广州首次召开。8 月 31 日，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 月 1 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林庚白以众议院秘书长职兼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柳亚子说道：“国父孙总理既令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广州，奠护法之基；而庚白方任众议院秘书长，亦受命尽携院中枢密文件，间关入粤。国会非常会议于以告成，举国父

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命刘建藩率师北伐。是役也，论者辄谓庚白之功，不在璧光下云。”林庚白在《自传》中也写道：“一九一七的六月，张勋拥溥仪‘复辟’，我带了我的炎南四哥，把国会的印章和重要文件，偷偷地搬到南方来，同时伍廷芳先生，也带了国务总理的印章，一起追随着我们的总理中山先生，带领海军之一部分，开驶到广州护法，成立的大元帅府，非常国会，我便以非常国会的秘书长，兼充总理的秘书。后来因了国会的右倾分子，主张联络那时的桂系，而不满于总理的政策，我和议长吴景濂拍桌，终于拂袖而去。廖仲恺先生荐古应芬替代，同样的和吴不相容而去，结果是国民党和桂系破裂，国民党的右倾派和桂系合作，提出了改组护法政府的方案，由大元帅制一变而为七总裁制。我因和章士钊的私交关系，情不可却，又到了广州一趟，曾替七总裁的护法政府，草拟了一篇《零陵起义周年纪念的通电》，传诵一时。后来受了陈炯明的邀请去漳州，当时陈炯明和许崇智、吴铁城还有蒋介石先生们，都很努力于功勋，他们的军队，也就是那时国民党左派唯一的军事势力。一九一八年的冬天，我到了上海，参加唐绍仪们所主持的南北和平会议，同时我发现了国民党的右倾派和桂系军阀联直的阴谋，就向中山先生建议‘联滇倒桂’。恰好孙洪伊也这样主张，我就做了这个运动的中心。唐继尧本不认识我，以慕

名之故，屡次电邀，一九一九年的冬天，我就走了一趟云南。这时候中山先生和唐绍仪，一方面联滇，另一方面联段，想用政治的手腕，来促成南方军阀、北洋军阀的内部之各个分裂、崩溃。我到云南以前，也曾衔了使命到北平，和段派接洽，王揖堂于是替代了朱启钤来充北方议和总代表，那时我和号称‘小孙派’——孙洪伊派的郭同、王乃昌，号称‘大孙派’——中山先生派的黄大伟、叶夏声们，都是联滇联段这一幕活剧的要角。”“我还屡次到杭州，游说卢永祥，一度地回福州，指导李厚基，利用他们的军队，援助国民党左派。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回福州那一趟，事势很是严重的，李厚基的部下臧致乎，受了直系的运动，要把李厚基接济陈炯明的一大批军械扣留！我于是约同胡汉民和方枢、陈乐山、石小州四人，在上海的德国领事馆二楼，秘密协商一次，自己又跑回福州，好不容易地才解决，终于陈炯明攻进了广州，中山先生又回去继续革命。可是那时北洋军阀的破裂，已一天天的尖锐化，我于是跑杭州，跑北平，跑奉天，大做其‘纵横捭阖’的政客起来了。一九二二年，唐继尧回滇，又电邀我去，但因我的主张不能够实现，唐对于追随中山先生来推进国民党左派的革命的意见，始终是怀疑的，所以我就回了北平重新过着官僚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创办《复报》，击北洋军阀利害，同时我因受了五四运动后的思想界的影响



响，也很同情于‘社会主义’。《复报》出版，极其风行，但我个人的生活，依旧笼罩着资本社会享乐主义的色彩。”

上述这两段文字，林庚白较为详细地交代了1917年至1924年间，自己在派系纷纭、山头林立、变幻莫测的时局中，坚定追随孙中山革命，亲历两次“护法运动”的情形。

1918年至1919年，林庚白受孙中山之命，多次往返于云南、北平，游说云南唐绍仪、直系段祺瑞等人，试图促成孙中山联滇联段的举措。1920年，林庚白奉孙中山之命，穿梭奔波在杭州、福州、上海等地，在危急中将被军阀扣留的大批军械解救出来，送到当时支持孙中山的陈炯明处，使得陈炯明顺利攻进了广州，让孙中山又能回到广州继续革命。

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兵分三路，开始北伐。6月3日，孙中山发表通电，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人扶持黎元洪复任总统。同日，广州非常国会通电声明：中华民国合法大总统及合法国会均在广州。6月11日，黎元洪进京就任大总统职，北京国会恢复，林庚白辞去自1917年春就任的众议院秘书长职务。然后，他再赴昆明，游说唐继尧入粤支持孙中山，未果。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上永丰舰，坚持了50多天，于8月9日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宣告失

败，广州非常国会也就此消亡。

由于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在孙中山赴上海后，林庚白移居北京，1924年出任铁路局长及铁路会办等职，但他同情社会主义，欲利用军事势力来促成革命，就创办《复报》，著文攻击反动军阀。

1923年1月16日，滇桂联军攻入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继续履行大元帅的职权。3月，孙中山在广州建成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兵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进入北京。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暂时厝棺于北京香山碧云寺。1926年北伐军攻下武汉，林庚白曾赴南昌、汉口、郑州、信阳、石家庄等地，先后说服靳云鹏、魏益三、田维勤等军阀，率军队归附国民革命军。1927年，林庚白对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主导的过激行为不理解，更难以认同国民党右翼反动派血腥的“清共”举措，就从汉口返回上海，闭门读书，研究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兼及欧美文学。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林庚白受聘外交部顾问及南京市政府参事，遂迁居南京。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出北京香山碧云寺，从前门火车站南下，沿途30万民众送殡；5



月 28 日，灵车抵达南京；5 月 29 日至 31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三天公祭；6 月 1 日，奉安大典结束。这段日子林庚白生病，且对国民党当权派大肆“清共”无法苟同，没能参加孙中山的迁葬奉安大典，但他于 1929 年 6 月 13 日在南京写了一首诗《中山先生之丧，归自北平，余以病未获躬与国葬，赋诗志哀》：

终见威灵动九夷，风车云马怆来迟。
饰终岂复平生意？观政能深后死悲！
一恸微言成附会，群飞孱国益支离。
虚怀爱士今难覩，凄绝羊城执手时！

1930 年 4 月 10 日傍晚雨天，林庚白和柳亚子夫妇儿女等友人，驾车游览镇州的金山、焦山后，又进入南京，拜谒了中山陵，游玩了汤山，但出汤山后，他的车忽然发生故障了，其诗云：

中山陵畔两车驰，怆绝微阳挟雨丝。
有客新从江国至，游春最与晚晴宜。
相携玉雪花应妒，小集朋尊燕已归。
诗料盈前天所命，毁车更与话临歧。

与柳亚子夫妇等一起游汤山，至灵谷寺、中山陵，“抚今念往，怅然又作”，题诗忆及孙中山：虚怀爱士黯难忘，灵爽犹令党未亡。
忽有温馨心上过，记携倩影向斜阳。

1929 年孙中山迁葬南京后，林庚白多次去中山陵缅怀孙中山，上述诗歌既抒发了自己对孙中山先生一以贯之的推崇之情，也彰显了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品质：虚怀爱士和清廉执政。同时，也流露出对国民党当局者背离孙中山

遗志的失望。

1929 年 10 月 18 日，林庚白于南京写有诗歌《世乱未已，党事益纷，于亚子通问，数数相及，歌以当哭》：

挟山超海岂无方，愤世悲天未算狂。
缄札相哀余二客，阴沉不尽是残阳。
可胜玉石同焚惧？端为人琴俱邈伤。
味取弥留当日语，低徊凤德惜孤凰。

1938 年，林庚白有诗《总理逝世纪念日感怀韵》：

心危肝胆与枝梧，灵爽犹能启壮图。
邦瘁吾徒终倔健，路歧所向莫模糊。
微言不共山河碎，忌日休教血泪枯。
百链当为真好汉，可槛看碧竟成朱。

1940 年，林庚白写有《总理诞辰志感》：

覩国先几独，怜才自古无。
非徒排众议，亦颇择狂夫。
党敝忘鸩毒，官邪到腐儒。
贻谋知不再，莫更失联吴。

上述三首诗，反映了孙中山遗愿和孙中山精神对林庚白长久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弥留之际，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彼此拆台，且当轴者违背孙中山“联共”“容共”的方针，国共分裂，内斗与内战频仍，这是林庚白深为忧虑的，他在诗文中多次批评痛斥国民党的“党敝”、违背孙中山遗愿、内讧不断等问题。柳亚子称赞林庚白“所以为党国谋者，盖如是其忠且挚焉”。诚哉斯言！

裁缝和剃头匠的诗

万小英

福州黄巷林细细，业裁衣，暇辄以吟诗自遣。《咏史》云：“烛影斧声千载案，珍珠薏苡一时冤。”《白桃花》云：“不争柳絮风前韵，只欠梅花雪里神。”

福州西门有林兴者，业剃发，亦以吟诗自遣。《偶感》云：“几辈下场如傀儡，何人作梦到邯郸？”《夜思》云：“酒尽寒生花影外，诗成愁入雨声中。”

以上是《清稗类钞》中的两则笔记。前者在《三坊七巷志》亦有留载。如果有一道题——怎样证明福州文化底蕴深厚？这两则笔记恐怕胜过文章千万。

林细细和林兴，清代黄巷的裁缝师傅和西门的理发师傅，身份低微，却有高雅的爱好，闲暇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吟诗自遣”，令人肃然起敬。其诗水平如何，竟可以载史流传，我们可以鉴赏

一番。

《咏史》云：“烛影斧声千载案，珍珠薏苡一时冤。”烛影斧声，又称斧声烛影。宋开宝九年（976）十月壬午夜，太祖赵匡胤大病，晋王赵光义进入寝殿后，宫中侍从远远见到烛影下赵光义不时离开座位，还听到有斧头掉落到地上的声音。第二天一早，就传出赵匡胤去世的消息，这件事在史书上被称为“烛影斧声”。后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赵光义是否谋害太祖篡位，对此事件后世议论不一，成为宋代悬案之一。

“珍珠薏苡”源见“薏苡明珠”，谓真假是非混淆不清。《后汉书·马援传》记：汉朝名将马援率军在越南打仗，常吃点薏苡仁以避瘴湿之气，回国的时候，带了一车大个的薏苡仁，想着可以做种子栽培，但是有人眼馋了，进谗言冤污他带回来的是一车明珠宝贝。



《咏史》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所流传的史实就如“烛影斧声”“珍珠薏苡”一样，令人可疑。我们似乎听见作者在发问：历史的真相在哪里？

《白桃花》云：“不争柳絮风前韵，只欠梅花雪里神。”这是咏物诗，赞颂白桃花有谦逊之姿，不与柳絮争风夺韵，但是与梅花傲雪的精神相比，却有欠缺，少的或是那种孤高绝俗、贞洁自爱的情操吧。

古人喜欢托物言志，表面对物进行吟咏，其实寄托一番情怀。作者看见白桃花，联想到白柳絮和白雪中的梅花，对这三者的风度精神有着精准把握。从表述看，作者无疑比较推崇傲雪之梅所蕴含的品质追求。

《偶感》云：“几辈下场如傀儡，何人作梦到邯郸？”《列子·汤问》记：周穆王时巧匠偃师造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木偶人，即傀儡。“邯郸

梦”，又称“黄粱梦”。唐朝沈既济《枕中记》里说，卢生在邯郸旅店住宿，入睡后做了一场享尽一生荣华富贵的好梦。醒来的时候小米饭还没有熟，因有所悟。这个故事之后一再被人续写改编，有《南柯记》《邯郸记》《续黄粱》等。

作者感触，人一代代地活着，怎么有那么多人总在做着享尽繁华的好梦？

《夜思》云：“酒尽寒生花影外，诗成愁入雨声中。”这是作者的生活片段记录。这个晚上，他独自喝了点酒之后，看着远处花影婆娑，寒意袭来；雨不知何时落下，心中的愁绪化成诗句，伴着雨声，敲打着这样的夜晚。

福州黄巷林细细、西门林兴，在文化的历史长河里，留下这八句诗。然而这也就足够了，这些诗句的格调品位、艺术表现力、感染力等，与文人诗相比，也毫不逊色。世上的裁缝与剃头匠



何其多也，但能以诗名留史的裁缝与剃头匠绝无仅有，起码我还没有听说过。

这种现象让人惊叹，但是在福州这块“海滨邹鲁”的土壤，似乎也正常。“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头巷尾读书声。”福州向来学风昌盛，到处是读书人、读书声，普通人接触、学习文化的机会并不难获得。

以林细细所在的黄巷来说。黄巷属于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发轫于晋代，形成于唐末，至明清年间达到鼎盛，一直是“闽都名人的聚居地”，被称为福州的历史之源、文化之根。黄巷在塔巷之南。晋永嘉年间，中原黄姓人家避乱入闽，落户在此，故称黄巷。唐代黄璞返隐归居这里。黄巢军入福州，因闻黄璞的大名，命令兵士“灭炬而过”。巷内历代多住儒林学士，人文荟萃。清代知府林文英、榜眼林枝春、巡抚李馥、楹联大师

梁章钜、进士陈寿祺和赵新等都曾居巷内。

裁缝和剃头匠的工作日常与人打交道。可以想见，林细细之所以能成为“诗人”，与黄巷深厚的文化氛围与崇尚文化的环境分不开。耳濡目染之下，不会作诗也会吟了。

如果说，作诗是一种技能，那么心中有诗情，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林细细和林兴，身处社会底层，但心有高远之境。他们的生平已无从考，但从流传下来的寥寥诗句，亦可勾画出他们的品性与生活。市井小民意味着每日辛苦劳作，生活负担较沉重，但是这些不妨碍他们在劳碌奔波的间隙，怀揣诗人的情怀吟诗问史，抚花弄酒，思考人生。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人生，难道不令人动容与感怀吗？

而这样充满诗情、文采流溢，有着平凡的文化力量的福州，难道不令人神往与赞叹吗？

花枝空满迷处所

孟丰敏

徐燦（1563—1639），字惟起、兴公，别号三山老叟、天竿山人、竹窗病叟、笔耕惰农等，祖籍侯官（今闽侯县）荆溪镇徐家村，闽县（今福州）鳌峰坊人，是明代藏书家、文学家、书画家、金石学家、戏曲家、茶学专家。

徐燦之家世

徐燦是南朝著名文学家徐陵的后人，其父徐棉（1512—1591），字子瞻，官授江西南安府训导，后升至广东茂名县教谕，官至永宁令。徐棉精于《易》，能诗及书，喜欢读诗写诗，外出时皆随身携带一部《诗韵要释》。他的三个儿子徐熥、徐燦、徐燦皆受其影响，成为诗人。

徐燦在《红雨楼题跋》中提及徐棉担任学官

时，其两次作诗《登金精山》《迎春诗》参加考试，都获得第一。

明万历十六年（1588）徐熥、谢肇淛中举人，两人同赴京赶考。徐棉每日为徐燦解说李东阳的《拟古乐府》二三首。他参加过童试，后来却摒弃科举。

徐棉79岁去世前写诗嘱咐儿子徐熥道：“汝辈俱以四声驰誉，吾心甚喜，家学不墮，是在汝辈。然吾生平有得意诗百数篇，可出长笺，吾为汝书之。”徐棉写诗时，徐燦在一旁侍笔砚。但是，徐棉的诗并没有流传下来，连徐熥编撰《晋安风雅》收录明朝诗人佳作时，也未囊括他父亲的这两首诗。而他的两个儿子徐熥、徐燦的诗作却被后人收录到各种诗集中。



《徐氏笔精》，徐燦撰

徐燦的文艺成就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徐燦随兄徐熥致力于诗歌创作，诗作以清新隽永见长。据不完全统计，他撰辑的著作约有50种，有《红雨楼纂》《闽画记》《闽中海错疏》《荔枝谱》《榕阴新检》《徐氏笔精》《闽南唐雅》《鳌峰诗集》等。《红雨楼全集》未刊，近人陈衍《石遗室书录》著录钞本，后为上海图书馆购得。今据稿本覆勘，全书重加校定，改题《红雨楼序跋》。徐燦的诗话对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他工于书画，可惜传世作品甚少。今福州法海寺存有他手书的碑记。他亦精通禅理，颇负声望，文人、诗僧皆以得其好评为荣。

他博学多才，熟知地方文献，曾三次参加《福州府志》编修工作，还修撰《雪峰志》《鼓

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他提出修志的见解：“省会人物之盛，载笔不得不严，在一州一邑，唯恨文献不足，不可一概严削。”

他对荔枝种植和保管也有较深研究，著有《荔枝谱》，所载品种多达100种，可与宋代蔡襄《荔枝谱》并美，很有科学价值。

徐燦之交游

徐燦平生交游广猎，到过浙江、江苏、广东，“足迹所至，遍揽四方豪俊”，“简札往来无虚日”。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和大学者钱谦益等皆为其好友。

徐燦终身积极参与文学结社，主持或参与的诗社有：芝社、邻霄台社、红云社、石仓社、西峰社、三山耆旧社等。万历前期，曹学佺入仕前，徐燦曾与曹学佺、邓原岳、徐熥、谢肇淛、陈荐夫、林宏衍七人在福州东郊竹均乡（邓原岳老家）结社，世称竹林后七贤。后又与叶向高、翁正春、曹学佺、谢肇淛、陈价夫、陈荐夫等结“芝社”，人称“芝山诗派”。徐燦和曹学佺并称诗坛盟主。后人誉为“兴公诗派”。

万历三十一年（1603）癸卯中秋大会，由曹学佺发起，闽浙两地词人、名士百人，在乌石山邻霄台宴集。活动时间一直延续到次年年初。这次社集在全国颇具影响力，其规模不亚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南京举行的秦淮大社。宴集时丝竹殷地、列炬熏天，闽剧从此由下里巴人变

成阳春白雪而登堂入室，成为雅乐，传播海内外。

徐燦之藏书

徐燦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图书的收藏与校勘，自万历壬辰（1592）至辛丑（1601）曾三次到江浙云游，所见既广博，遇图籍广加收集，借藏抄录，积至十数年，总计7万多卷，且所藏多宋、元秘本，毕生求书、藏书，尤精校勘，将所藏书辑成《徐氏家藏书目》，以便查考。

他撰有《红雨楼书跋》2卷、《徐氏家藏书目》4卷，仿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体例，成《红雨楼书目》7卷，按四部分类，该目收明代集部较多。其中辑录的“明诗选”，还加注作者生平，是研究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著录的140种元明戏曲，是研究戏曲史，尤其福建戏曲史的宝贵资料。藏书印有“徐印惟起”“晋安

徐兴公家藏”“汗竹巢”“宛雨楼”“鳌峰徐氏宛羽楼藏”“闽中徐惟起藏书印”等。

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记载：崇祯己卯，徐燦带着儿子到山中拜访钱谦益，相约去搜藏书。徐燦交游多向学之士，探求艺文，潜心著述，酷爱载籍碑帖书画，“善聚善读”。清代儒学家陈寿祺在《左海文集、红雨楼文稿跋》中评价其“咸考证精核，有先贤遗风”。

徐燦在《徐氏笔精》中作《聚书十难》，分析历代私人藏书不能久传，“何也？非深知笃好者，鲜不越也……贤哲著述，以俟知矣。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矣，何可不借？”又说：“来借者，或蓄疑难，或稽异同，或补异简，或搜奇秘。”因此，他欢迎朋友前来阅览，并为阅书者设几供茶。

徐燦未曾考取功名，获得一官半职，主要靠父亲的遗产度日。父亲的藏书很丰富，他个人又



鳌峰坊



《重编红雨楼题跋》，徐燦撰

喜欢藏书，因此建造了“红雨楼”“绿玉斋”“南损楼”以藏书、校勘图书。徐家除了藏书楼外，还有别墅“风雅堂”“柿叶山房”。晚年，好友曹学佺资助他建造“宛羽楼”，他也为长子徐陆建了藏书楼“汉竹巢”。书斋建成之后，徐燦给儿子写了一首《题儿陆书轩》：“菲饮食，恶衣服，减自俸，买书读。积廿年，堆满屋，手有校，编有目，无牙签，无玉轴，置小斋，名汗竹。……青箱业，教儿陆，继书香，尔当勖。”

或因建造藏书楼花费巨大，又没有收入，他很快穷困潦倒，但仍喜欢接济朋友。因此，朋友们送他一个雅号“穷孟尝”。

徐燦的儿子徐陵也是著名诗人，著有《尺木堂集》。徐陵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周亮工、钱谦益、龚鼎孳、王士禛等人都有交往唱和。钱谦益评徐陵“能为艳诗”。

徐燦晚年，小儿子把家产败光。徐燦于崇祯

十二年（1639）十月十三日于贫困交加中离世。

清军占领福州后，把徐家宅邸当作养马所，徐燦的儿子徐延寿在仓促之中，无法整理和带走全部藏书，一年内把藏书转移了三处。不久后，徐延寿病逝于长沙，藏书也散佚殆尽。

福州藏书家林佶于顺治十六年（1659）从徐氏所著《红雨楼全集》中选辑140多篇，有抄本传世。嘉庆年间，郑杰购觅已经流散的徐氏藏书，抄得87篇，辑为一卷，刊入《注韩居丛书》。70多年后，缪荃孙在光绪初年向费氏抄得林佶的抄本，30年后将林佶与郑杰的两家辑本分类合编，题为《重编红雨楼题跋》，上卷录四部载籍，下卷录碑帖书画，共224篇，但这只占红雨楼全部藏书量的二三成。

林佶曾个人出资在道山亭附近建造瓣香堂。瓣香堂祀奉四位名贤：撰写《道山亭记》的曾巩、闽剧儒林始祖曹学佺、明万历御史陈一元、晚明著名诗人徐燦。

红 雨 楼

徐家因家中藏书丰富，建造了七座藏书楼。其中红雨楼堪比当年的宁波天一阁。

《榕城考古略》记载：“红雨楼，在鳌峰坊。明山人徐熥、徐燦所居，寝室后有楼三楹，颜曰‘红雨’，为兄弟吟眺之所。易代之后，沦为民庵。又有宛羽楼、清晖阁，亦二徐别业，今并失其址。”



徐氏故居旧貌



古莲寺

据说其所建的藏书楼——红雨楼之名，取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百舌吟》“花枝空满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指万卷书犹如繁花似锦，令人赏心悦目，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红雨楼外有一片桃林，桃花纷飞时如下红雨，风景旖旎。

《榕城考古略》记载：绿玉斋亦徐家别墅，徐熥自己云：“红雨楼之南，有园半亩，中有小阜，乃构斋于山之坪。由园入斋，石磴数级，曲折逶迤，列种筠竹。斋旁灌木环匝，下置石几一，石榻二。夏月坐阴中，鸟语间关，蝉声上下。斋止三楹，余兄弟读书其中，无长物，但贮所蓄书数千卷。山中树木虽富，惟竹最繁。素笋彤竿，扶疏掩映，窗扉不扃，枕簟皆绿。清风时来，天籁自鸣，故名绿玉斋云。”南损斋云：“徐兴公聚书万卷，居鳌峰麓。客从竹间入。环堵萧然，而牙签四围，缥缃之富，卿相不能敌也。”

徐燦的《绿玉斋叙》记述：“何仙劫灵，占于山而托迹。野夫招隐，卜山下以栖幽。遂筑小

垒，聊供偃卧……此正宜置邱壑之中，栖迟衡门之下者也。燦迹犹蓬累，逸在布衣。俗韵寡谐，丰草鹿麋为友。杜门自适，寒山片石堪言。量腹进芝苓，欣然一饱。度形扈薜荔，岂曰无衣。游目骋怀，天然图画。逃虚息景，痼疾烟霞。环四季而皆宜，心神之俱畅。箸匕不堪以谢客，敢方叔夜之高标。赋五噫歌于关门，愿蹑伯鸾之逸轨。汉阴抱瓮，息彼机心。东海投竿，坚兹远志。苍梧翠柏，可指为盟。夜鹤晓猿，寔闻斯语。万历己丑秋日绿玉斋主人题。”

由以上记载可知，红雨楼的南边园林是绿玉斋，就是徐氏兄弟的藏书楼。清代时，红雨楼已被改作尼姑庵，其旁是古莲寺。而今，鳌峰坊 33 号老宅门口的牌匾上所书之红雨楼是否即当年的红雨楼，有待继续考证。

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此鳌峰坊 33 号红雨楼是杨氏兄弟宅邸（于麓山馆），20世纪 40 年代又转售他人。2020 年，此地为“一秒素菜馆”。

毛奇龄和《后观石录》

余斯伟

清代浙江萧山人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一字齐於，号初晴，为明季诸生，博学多才，记忆力超群，中过博学鸿词科。明亡后，他“祝发窜身山谷，读书土室中。为人讥议，品目严峻。一时士流多忌之。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使馆纂修官等职，博览载籍，著书甚富，大好说经”。其“西河先生”之名远播大江南北，有《西河集》492卷名扬当世。

清康熙时，国泰民安，百业俱兴。福州的寿山石开采业和加工业也蓬勃发展，出现了中国石坛上罕见的“寿山石热”，人们以拥有福州寿山石为荣。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毛奇龄入闽寓居于城内开元寺。其间，他闻见“闽县陈公子越山，忽斋粮采石山中，得妙石最多。载之京师售千金。每石两辄估其等差，而数倍其值，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王恢闽以来，凡将军督抚，下至游宦兹土者，争相寻觅……而于是山为之空，近则入山无一石”。福州人“贵石溅玉”



毛奇龄像

之社会风气，引起了他极大兴趣。因此，他费了诸多心思，通过种种关系渠道，好不容易才购得寿山石佳品49块，但也只是“上者十三，中上十四，中十二，中下十”。其间，他读到了好友高固斋的《观石录》，深有启发，于是“谛观其次，为录一笺”，全篇达3600多字，并题其篇名为《后观石录》，以表达对好友撰写《观石录》的敬佩之意。

《后观石录》中对艾叶绿的描述

毛奇龄是位博闻多见的收藏家、玩石者。他早对闻名石坛的灵璧石、六合石等深有研究，所以他观察寿山石的眼光精准到位，并对每件藏品的规格、色泽、石质乃至纽式刻工等都有详尽的记录。他所记叙描绘的藏品不仅形象清晰生动，而且点评文字入木三分，耐人寻味。在《后观石录》中，他沿用高兆评石标准，“以艾叶绿录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又次之”为序来分述自己的藏品，其文字流畅，辞藻华丽，堪与高兆



《观石录》相奇并艳，故被后人誉为“双璧”。

对于上品艾叶绿，他写道，艾叶绿，平直横径各寸，而卧螭钮——杨玉璇制钮。绿色通明，而底渐至深绿色，独其佳处稍白，则艾具叶矣。骆幼重曰：骤观之，但见两螭环自掉足，蜿蜒绿丛中。上半如碧玉，下半如红毛玻璃酒瓶。

对于上品羊脂，他写道，高二寸半，径二寸，横一寸。白泽钮，玉质温润，莹洁无类，如博酥割肪，膏方内凝，而腻已外达。

对于上品鸽眼砂，他写道，此旧坑。高二寸半，横径各寸，辟邪钮。通体荔红色，而谛视其中，如白水炉丹砂，水砂分明，粼粼可爱。一云“鹁鸽眼”，白中有丹砂，铢铢粒粒，透白而出，故名“鸽砂眼”。旧录亦以此为神品。

他效法好友高兆，将上、中、下品寿山石材的质地、色彩、凌度、亮度与章形雕纽的造型、走刀等技法完美地表达出来，让石材、技艺、审美三位一体地融合在欣赏鉴评的全过程之中，阐释文字准确、生动、形象，体现了清初印纽雕刻精致化的艺术特色，扩大了寿山石及其雕刻艺术在中国石坛的影响力。

他在文中所记叙列举的藏品尚有蔚蓝天、虾背青、肉脂、炼蜜丹枣、桃花水、三合一、晶玉、白花鹰背、二合一、洒墨、泥玉、杏黄、砚水冻、藏经纸、桃晕、红粉、苹婆玉、荀玉、象玉、蜜蜡、秋葵蜜蜡等29种之多。其介绍文字品象清晰，生动到位，一时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目光，让寿山石成为中国玉石收藏市场的抢手货。

毛奇龄是位富有学识的评论家、鉴石者。在《后观石录》中，他对高兆提出的“石有水坑、山坑”之说，予以肯定，并加以补充。他写道：“收藏家分别其旧藏者，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辄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势力不能夺。石益鲜，价值益腾，而作伪者纷纷日出，至有假他山之石以乱其者。”毛奇龄和高兆按寿山石矿山地点分类石种的办法，被后人称为“三坑法”或“三坑论”。“三坑法”的提出，让寿山石种的鉴别有了明确依据，促进了寿山石市场的开发交易与加工销售，可谓现代寿山石矿石学的端倪。1999年1月6日，《福建省地方标准寿山石雕石种名称标识规定》仍按照前后观石录所提出的“三坑法”来进行分类，可见高兆和毛奇龄的眼光与论见的实用性与科学性非同一般。

毛奇龄是位闻名天下的文学大家、护石者。他和好友高兆一样，对“于是山为之空，近则入山无一石”的掠夺现象深表不安，并予以谴责。

他和高兆都对民间艺人十分尊重，在《后观石录》中，他认真记叙描绘了杨玉璇为代表的福州雕刻艺人的高超技艺，叹呼“真鬼工也”。他写道：“白花鹰背二，又名‘灰白花锦’。高二寸半，横、径各一寸三分，一葡萄钮，一瓜钮，其钮为杨璿所制，葡萄、瓜俱纯灰色，独取其白色而略渗微红色者为枝叶，其叶中蠹蚀处，各带红黄色，浅深相接如老莲画叶。且嵌缀玲珑，虽交藤接叶，而穹洞四达，真鬼工也。石身如冰制

白花锦，平蔓间，亦似有枝叶横披，纷拿盘攫之势。”

毛奇龄对自己的49件收藏品的观察与评述令人叹服。他在文中所记叙的印件纽雕品类十分详尽，多达二三十种。有卧螭纽、白泽纽、辟邪纽、狻猊纽、蟠螭纽、狮纽、圆身唬纽、卧貔纽、金貌纽、螭虎纽、蹲獮纽等，真可成为后人学习传统印章纽雕的教科书。

由毛奇龄撰写的《后观石录》是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之作，文中保留着清初诸多寿山石文化的历史信息。如：“每得一田坑，辄转相传玩，顾视珍惜，虽势力不能夺。”表明了田坑（田黄）石是明末清初新发现的石种，证实了清施鸿宝《闽杂记》所记“明末节愍公（曹学佺）见奇赏之，遂着于时”的真实性，生动揭示了明末清初是寿山石田黄鉴赏文化兴起历史时期。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2），毛奇龄写成《后观石录》，后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被刊于《西河合集·文集》中。因其历史价值甚高，乾隆鲁曾煜《福州府志》、道光陈寿祺《福建通志》等多部志书相继节录引用。

乾隆年间，纪昀在撰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16时，收录了《后观石录》，并在子部谱录类《观石后录提要》中介绍：“观石后录一卷，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记其客福建时所得寿山诸石。一一评其形色，凡四十有九，自序谓，见友人高兆作观石一录，流传人间，故此曰‘后录’。其记寿山之石，明谢

在杭始言之，然未之见。后山僧磨为印，亦不甚著名。国朝陈日浴乃斋粮开断，大著于世，其事在康熙戊申。考古人印，惟铜玉最多，顾氏印薮，或间注录宝石印，亦不知其为何宝石。其以灯光冻石作印则始于文彭，国朝初已久行于世，不待康熙七年陈日浴始采而鬻之。奇龄第据所见言之耳。”

寿石煌煌光照世，双璧灼灼朵颐人。前后观石录面世之后，迅速产生巨大影响，被公认为寿山石文化理论之开篇专论。清人张潮在《昭代丛书》乙篇四十五《后观石录题辞》中赞评：“石有足供几案之玩者，在古有二，在今有三。曰灵璧，曰六合，旧所有者也。曰寿山，新所增者也。夫寿山之石，由来旧矣，曷为属之于今。曰古之寿山，其佳者仅明润而已，非经名人篆刻，不足传也。若今之寿山，或五色各擅其一，或五色之全备，其文则或如云霞，如山冰，如锦绣，如草木鸟兽虫鱼，加以制钮之精，命意之巧，即不镌一字，亦足以令人把玩，不忍释手，岂旧日之可比乎？……高君固斋，曾作《观石录》，令毛大可先生复作《后观石录》，民阅之次，不禁朵颐。合之前编，可以称双璧云。”

《后观石录》刊行后与高兆的《观石录》相互对照、相互呼应，彰显了福州寿山石“色彩斑斓”“品种多样”“柔而易攻”等石质特色，扩大了福州寿山石的社会知名度，让寿山石与浙江青田石、昌化鸡血石并列而闻名天下，成为中国三大印石瑰宝，翻开了“寿山一片石，印坛两重



乾隆“田黄石三链章”

天”的历史新篇章。

山以石名，石以文彰。《后观石录》与《观石录》在清初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效应。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咸丰等多位皇帝，选用寿山石极品田黄石、芙蓉石等，或雕刻印玺，或祭拜天地。其中，尤以乾隆“田黄石三链章”“九读鸳锦云章”等成为闻名于世的国石至宝。今人陈章汉亦有《寿山石赋》，赞誉前后观石录作者高兆和毛奇龄的历史功绩，词句精彩到位：“高兆握瑜怀瑾，嗜好为移，有观石录问世；奇龄审石索隐，首开矩镬，后观石录既行。三坑次第，双璧有凭。是以藏者忘形，赏家养心；趋之若鹜，点石成金。”

满门忠烈铸雄魂

——唐司马参军刘昌祖

刘长锋

莲花峰峦，岭迥溪环，雾重林秀，古来是福州北郊一处风水宝地，一代闽王王审知陵雄卧在这片绿荫碧野中。东侧十几米，有座同年代的古墓紧挨其旁。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谁的墓能有如此待遇？原来这墓主便是佐闽王王审知、军功显赫的先锋将刘昌祖。

刘昌祖，字贻孙，号守仁。河南光州固始县（今属信阳市）人，系汉高祖刘邦13世裔彭城从亭里官大夫刘茂的18世裔孙。刘昌祖当年家境殷实，娶河南光州刺史（后来追赠的官职）王恁之女，即闽王王审知的胞姐。其伯父刘存、父刘在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他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信奉“忠孝仁义礼智信”，也练得一身好武艺；“素性英明磊落，慷慨负奇，人皆钦慕”。唐中和年间，黄巢起兵世乱，他与兄昌茂、昌荣随伯父刘存及其三子加入王审知义军入闽，初任先



刘昌祖像

锋将，屡立军功，官司马参军，后赴汀州讨叛战死。长兴三年（932），闽王王延钧赐葬于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斗顶山闽王王审知陵东侧。

加入起义军

唐朝末年，政治腐败，藩镇兴起，战争连年，生灵涂炭，农民被迫揭竿而起。唐乾符

年间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义军攻洛阳，克长安，唐僖宗出逃成都，黄巢于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齐”。与此同时，江淮间诸种势力乘时蜂起。寿州屠者王绪亦聚众起事，据霍邱县自为镇使。唐僖宗中和元年(881)三月，王绪攻占了寿州，杀寿州刺史颜璋，起义军“有众万余”。同年九月，“绪获光州后，于境内召士民以广部伍”。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初，王绪为扩展固始县地盘，争取当地力量，其妹婿刘行全说服了固始县东乡王集的王潮、王审知、王审珪兄弟加入王绪队伍，里应外合，杀了县令，攻陷固始县。出于固始名望家族的刘昌祖，父刘在逝后，“事存公(伯父)如事父，存公亦视之犹子”。三王起事时，他与兄昌茂、昌荣随伯父刘存一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妻族王潮三兄弟的义军队伍。刘存因刘昌祖佐王有功，被王潮纳为幕僚贤士。天祐元年(904)，闽王赐凤岗(今福州金山)卜居，其后裔出“两侯”“八贤”173名进士，成为福州名望家族，这是后话。

授予先锋官

此时节度使秦宗权称霸许州、蔡州一带，王绪自知势薄，便投靠秦宗权求一时安定。秦宗权封王绪为光州刺史。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秦宗权突然向王绪发难，王绪被迫“率光、寿兵五千人，并携吏民南奔”。刘存的三子三侄及家眷一

行也在其中。王绪授刘昌祖和刘行全为先锋官，授王潮以军正之职，王审知副之。光、寿南行军兵先后攻下了南昌(洪州)、吉安(吉州)、虔州(赣州)。到虔州后，一部分军队试探向广东进军，攻占广东曲江(韶州)；另一部分军队试图向福建汀州进军。此时王绪军队受到谭全播军队攻击，攻粤部队从曲江向广东潮阳转移，由潮阳进入福建，唐昭宗龙纪元年(889)抵漳浦，到达南安。大部队兵民在王绪率领下滞留赣州，受到攻击后向南进入闽西，占领汀州。

密谋擒王绪

王绪出身屠户，才不及人，心胸狭隘，多疑猜忌，部属将士只要勇谋才略超过自己或者气概非凡的，皆被他借故杀害，弄得军中人人自危。王绪率领光州、寿州兵民南下时，时值大旱，光、寿两州的将士多举家随军，但粮食难筹。部队行至南安县，王绪担心军旅累赘，下令全军：“凡随军老人孩子，斩无赦！”消息传出，全军将士激愤。诸将苦劝未果，与王绪严重对立。王潮老母也不能免。王潮等同他争辩，“绪责曰：军行有法，无不法之军。怒欲法之”，将士们都为王潮求情，才免王潮母亲一死。于是，先锋官刘昌祖遵照王潮母亲徐夫人谋划，密与刘行全等将官，在竹林活捉王绪，王绪愧而解巾自杀。刘昌祖等人果敢发动政变，稳定了军心，结束了王绪的统治。

随王攻泉州

为立新主，刘王两家互相谦让，刘昌祖力挺王家主事，“公辞，乃除剑划地，祝曰：拜而剑动者，奉以为主。至审知公拜，剑三跃于地，众以为神，罗而称之”。刘昌祖便领诸将共推王审知为主将，但王审知让位于长兄王潮。王潮拜受一军之主，决定进军成都勤王，经永春、德化、大田，到达沙县时，恰有泉州人张延鲁率领乡绅耆宿，携带牛、酒等物跪地相迎，请求驱逐贪婪凶暴的泉州刺史廖彥若。王潮立即挥师围攻泉州，刘昌祖鼎力协助，双方相持一年多，攻破城池，杀廖彥若，占领泉州。时任福建观察使的陈岩奏请，王潮任泉州刺史。

唐昭宗大顺二年（891），陈岩病危，派使者召请王潮到福州接管军政大事。使者未到泉州，陈岩已去世，陈岩妻弟护军都将范晖抗拒王潮接管。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王潮命堂弟王彥复、三弟王审知和刘昌祖等将领攻打福州。范晖坚守城池，久攻不克。王彥复、王审知、刘昌祖等将领再次发起猛攻。是年五月，城内粮尽，军心涣散。范晖见大势已去，仓皇逃走，途中被士兵杀死。董昌见福州城失，也撤兵回师。王审知从此声威远播，有20多股地方武装闻风来降，王潮迁署福州，改福州为泉州。

捐躯于王事

王潮拥有福州，称雄一方，逐渐占领福建全境。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十月，唐昭宗封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刘昌祖被王潮授为司马参军。这时王家、刘家居于新宁县芝山乡郭坑（今东关村汾阳境太平桥）。刘昌祖、王想遵从王潮理略，励精图治，召集离散流民，鼓励生产整饬部属，减轻徭役，放宽赋税，兴办义学，颇得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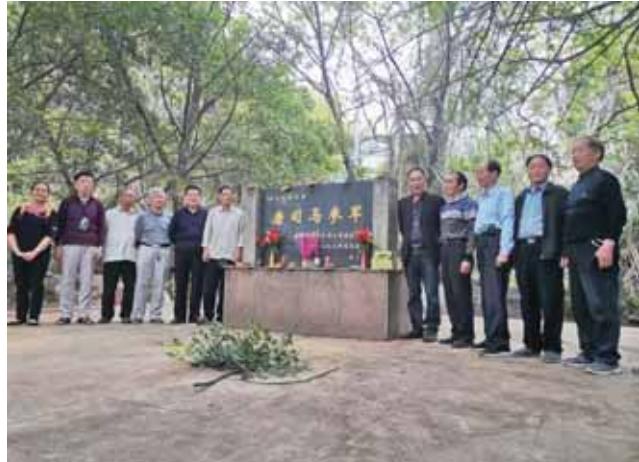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福建汀州刘继峰叛乱，王潮命张庸和刘昌祖协同攻打刘继峰。军队到汀州，刘昌祖冲锋在前，英勇作战，叛军准备充分，兵马充足，顽强阻击，战斗激烈。最后刘昌祖“战死汀州，歿于王事”，年仅48岁。

留下身后名

刘昌祖阵亡后，福建观察使王潮念其“歿于王事”，嘉其神勇，赐葬于莲花峰，从祀城隍庙东庑。后唐同光三年（925），闽王王审知病卒。唐明宗长兴三年（932）王审知之子王延钧任闽王，将王审知迁葬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的斗顶山，刘昌祖墓也赐随迁至王审知陵东侧十几米处。民国十年（1921），凤岗刘氏族人、海军总长刘冠雄改建其为石墓，民国三十七年（1948），南洋爱国华侨、族人刘家洙修成水泥墓埕。“文革”中，因学大寨平整土地，刘昌祖墓茔被当地大队用推



莲花峰斗顶山刘昌祖墓址纪念碑



刘昌祖后裔祭扫刘昌祖墓茔时合影

土机推毁。1998年冬，闽清族人台峰世系台胞刘思敬献资，经获省文化厅批准，在原墓址立碑纪念，成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二十多年来，福州凤岗刘氏祖祠管委会，每年在清明节都要组织族人前往祭扫纪念，以弘扬先祖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表达中华民族敬祖孝亲的美德。

《凤岗刘氏族谱》的记载也印证了上述史实。谱载：凤岗刘氏始祖刘存公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携三子三侄随王审知三兄弟入闽，后“长子昌龄，苦兵未娶，死节君难，赠魁辅侯；次子昌嗣，苦兵未娶而歿战征，由三子昌祚次子公較出继为之嗣子；公較，进士，官迪功郎，卒于泉州录事参军职上。三子昌祚，娶任氏，生三子，长子公榦，字尔軫，官至先锋都督，死节君难；次子公較，字尔偕，卒于泉州录事参军”。加上刘昌祖死节，也可谓一门忠烈。刘存公年高德劭，齿德兼优，闽王屡聘不赴，后任参知政事。

福州市有关部门对刘昌祖事迹也予以研究确认。2001年，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王审知委员会整理相关史料，在《十八将随王·五十姓从军》中载：“刘昌祖，王潮部将，官司马参军，卜居凤岗，卒后葬福州莲花山。”还引固始《开闽王审知》载：“光州固始人刘存之子（指三子三侄），王潮部将，父（刘存）子（指三子三侄）从王氏入闽，刘昌祖官司马参军，歿于王事，赐葬莲花峰，从祀城隍庙东庑。”

在闽王陵东邻的闽王纪念馆里，正殿列十八随王入闽将领和贤士，刘姓有：入闽先锋将刘昌祖、刘行全；佐王贤士有：刘存（凤岗刘氏入闽始祖）、刘山甫。近年来福州市闽王文化研究会每年都举行专门活动，以纪念闽王王审知和入闽先锋将刘行全、刘昌祖。王、刘两个家族后裔共聚一堂，追念先祖们开拓闽疆的丰功伟绩。

林森碑文与陶江林氏族谱轶事

林榕平 / 李 纶

“双木”林是福建第一大姓。6个福建人中就有1个人姓林，且森林覆盖率（66.8%）排名第一的福建省还是全国林姓人口最多的省份。

曾被尊为“五木先生”的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首推为林姓家族的杰出代表应不为过。林森（1868—1943），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自号青芝老人。福建省闽侯县祥谦镇凤港村人。



林森故居

1931—1943年间担任国家元首。

当陶江林氏36世孙林榕平收到新版林氏族谱，从家族谱系中找到他与林森的血缘脉络时，抑制不住，喜形于色。林榕平家乡的母亲河是淘江，淘江纵贯“尚干七里”南北。他家祖屋与林森故居近在咫尺。

然而，他手上捧着的还散发着墨香的族谱白



林榕平祖屋，林榕平（右）与李纶（左）合影

29世	守志④	守敬③	守望②	守根①	hao				守日	道士
	Y								Y	
30世	是春③	是善②	是峰①						是敬②	是善①
	Y								Y	
31世	由“凤港”迁“禄家”	造耕③	造耕②	造耕①					造耕②（迁禄家）	造耕①（迁禄家）
	Y		Y						Y	
32世	长信长智	长礼	长义	长仁	（早世）	林森（1868年2月11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近代政治家、教育家。民革元老，九一八事变下野的国民政府军调处主任，国民政府主席。			长信	
	Y	Y	Y	Y				Y		
33世	发端	（兼祧长仁）	发端					发端③	发端②	发端①
	Y							Y	Y	Y
34世								其勤③	其勤②	其勤①
								Y		
35世								茂焰③（林嗣衡）	茂焰②（林嗣衡）	茂焰①（林嗣衡）
								Y		
36世								林相平	林相和	林相华
									林相苏	林相熙

林榕平珍藏的《陶江林氏族谱》

纸黑字是《陶江林氏族谱》。地理上分明有淘江而无陶江，这又是为何？原来“陶江林”的始作俑者就是尚干林氏34世孙、清末举人林翰西。林翰西将“淘江”改为“陶江”的依据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帝师陈宝琛从一江之隔的螺洲村来到尚干创建了陶南书院。按照《尚干乡土志》记载，陶南书院的创建隐含了陈宝琛的一片苦心：暗寓陶铸南乡之意。

其实此陶非彼淘，但林森于1927年主持修订的族谱为何仍采用《陶江林氏族谱》呢？坊间有一戏说。话说螺洲陈宝琛受邀为族谱题序，陈宝琛是知书达理之人，以他尚干之外甥身份（其母亲为尚干人），不便对娘舅家的事说长道短。但拒绝身居民国要职的林公之请也不宜，况且陶江林与螺洲陈自陈若霖（清刑部尚书）那辈起便交织着错综的姻亲关系，陈若霖的姐姐即出嫁到

陶江林家。陈宝琛对此表示，林家的事就是陈家的事，不如将我陈家的耳朵给你林家，于是建议改淘为陶。这一来便难为了林公，毕竟陈宝琛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于是改版的《陶江林氏族谱》自此流传于世。林榕平的祖父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禄家岛修建的大厝（现被认定为闽侯县不可移动文物点）的前门石柱上雕刻的“淘水家声远”“禄沙世泽长”对联便是佐证。

当林榕平手持族谱，费力地向福州大学的李纾解释，其祖父林其塘，由“凤港”迁“禄家”后筑就禄家林春悌大厝（林森返乡休息处），以及陈若霖曾寄读于陶江林的进士家中的渊源等史实时，李纾仍听得似懂非懂。直到林榕平的话题触及螺洲陈与陶江林的姻亲关系时，李纾才有了反应，因为李纾的外婆陈露西（陈宝琛长女）系从螺洲陈家嫁到城内宫巷沈家。



林森主修的《陶江林氏族谱》由吴稚晖篆写。
从中可见，吴稚晖篆写的是“陶”而非“淘”



林森藏骨塔（连江）的碑文由广东番禺人胡汉民（胡展堂）题写



位于连江青芝山的林森藏骨塔

不同于本地的林榕平（血统纯正的林森族人），李纾的父亲是广东番禺人，母亲是福建侯官“船政沈家”人。

见李纾有些开窍，林榕平便拉着李纾看了他位于凤港的祖屋和林森故居，后又车载李纾夫妇到琯头青芝寺谒见林森藏骨塔。

1943年8月1日，林森病逝于重庆林园官

邸，弥留时仍嘱收复台湾。林森墓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林森官邸右前方。墓碑上刻“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墓后原有墓志铭，由吴稚晖篆额。重修后的陵墓未刻墓志铭。原有的墓志铭如下：

公生平宁静淡泊，勤整廉贞，举措抑扬，不私奸匿，造次颠沛，不离规矩，居常

和易，童稚可亲。临大难，持大节，则峥嵘岳岳，凛乎如神。

如此看来，民国公认的四大书法家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于右任，已然有半数被林森揽用，为陶江林篆书服务。

再往下看，两人禁不住停下脚步，认真注视对方。虽然他们相互结识已长达半个世纪，但李纾真不晓得林榕平与林森有如此亲近的关系。林榕平亦真没看出，李纾的祖父李晓生与胡汉民、吴稚晖的关系竟然如此密切。

李晓生（1888—1970），1906年在新加坡晚晴园谒孙中山，即日加入同盟会。1910年赴英留学。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孙中山由美国至英国。当时在伦敦的李晓生与吴稚晖代孙中山处理函电，随后李晓生伴随孙中山从伦敦起程，前往巴黎、马赛、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李晓生时任总统府秘书。

李晓生早在1907年便在新加坡结识了胡汉民。据李晓生所遗手稿记载：“一九〇七年余十九岁，改任总支部书记。是年汪精卫、黄克强、张溥泉、胡汉民、胡毅生、田梓琴、邓慕韩、张西林诸先生次第南来分赴各埠从事宣传。余被派返粤工作，持胡、汪两先生介绍函访朱执信先生于法政学校。一九〇八年春间复回星洲，被推任总支部总干事。”

后经孙中山和胡汉民介绍，李晓生于1910年在英国伦敦结识了吴稚晖。“一九一〇年（廿二

岁）由港乘日本邮船赴英。孙、胡两先生各给介绍函访吴稚晖先生于伦敦。谬承厚待视同子侄。”

林森、胡汉民、吴稚晖这三人的关系可以这么描述，容易被记住：

1928年，胡汉民任民国立法院院长，林森为副院长。

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林森扶正为立法院院长。

1943年，林森在国民政府主席任上去世，蒋介石邀请吴稚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却被吴稚晖拒绝。

李晓生是“汤山事件”中唯一能与胡汉民共处一宅、同舟共济之人。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于南京汤山，看守士兵把双龙巷的出入口拦住，不许人随便出入。当时只允许代理胡汉民一职的邵元冲以及立法院的秘书李晓生可以进出，因为



汤山事件后胡汉民（右4）等人赴法国养病前与李晓生（右5）留影

胡先生需要有人替他购物、请医等。

李晓生亦是唯一知道吴稚晖收藏了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草图的人。

据李晓生所遗手稿“补录二”记载：“国父居留伦敦期间，住在沙和大旅店 Savoy Hotel Strand, W. London。先生（指吴稚晖）辅助国父处理各事，至为劳碌。每日偕李晓生赴旅店工作，常至深夜始克回家休息。所有国内及各地函电多由先生作答。如属重要者，则先商诸国父，然后拟稿。”“补录三”又记载：“当日伦敦英文报载华中之革命军多有用五色旗者。国父大不以为然，急欲纠正。特走访先生计议。既经决定，遂即电知国内各省更正外，并在伦敦唐人街先悬之（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



100 年后的沙和大旅店正前门，李晓生曾孙李力搏摄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

另外，李晓生原稿“补录三”中有一被删除的句子，专门指出：“国父主张仍用青天白日旗一事乃在先生（指吴稚晖）家商议决定。”

李晓生是唯一在留学、教育、办学、出版等方面都与吴稚晖发生交集的人。1911 年，两人同在英国伦敦，服务于留英俭学会，后都随孙中山回国协助临时大总统工作。1913 年，吴稚晖与蔡元培一起赴法；李晓生亦以官费派遣赴欧留学。1916 年，两人同为法华教育会中方成员；李煜瀛（李石曾）与蔡元培、李晓生等发行《旅欧杂志》，由都尔中华印字局印行（中华印字局系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于 1906 年筹办）。1924 年，两人同在广州，吴稚晖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晓生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秘书长。1947 年，两人同在上海，吴稚晖任上海世界书局监察人，李晓生任上海世界书局常务董事。1953 年，吴稚晖海葬于金门；1970 年，李晓生葬于香港。

林森与李晓生的案头交集当是在中华民国的立法院。1928 年底，民国立法院成立于南京。林森于 1928 年 12 月 5 日至 1931 年 3 月 3 日担任副院长；1931 年 3 月 3 日至 12 月 9 日担任院长。李晓生为训政时期立法院的第二任秘书长，任期为 1931 年 6 月 20 日至 1932 年 1 月 21 日。两人的私交如何？逝者已矣，现已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后人林榕平和李纾却在 1978 年同读福州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时结识。或许，这一不期然的邂逅，乃是冥冥中先人赋予的生命空间的另一种延续？

高山之巅的诱惑

赖 华

黄昏，我终于站在高山之巅的草甸上，放眼四周，众山如丸，伸手可触天穹。视线沿着层层叠叠的群山探进深暮色的天际时，兴奋之余竟生出几许无处着落的惶惑；回眸山窝里的小村庄，依傍着静谧的斗湖，不见炊烟，无声无息；不知年岁的水杉林，兀自笔直地立在村外，守着村庄兴衰成败、生死轮回的岁月。“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触瞬间盘绕上心头，挥之不去。高山之巅的一眼湖泊，诱惑着一波又一波的山外之人奔它而来，也许不仅仅因为它的美色。

通往斗湖的道路，因年久失修，崎岖难行。峰回路转，我们逐渐走进深山，似闯入一个古老的植物世界。漫山遍野的树木郁郁葱葱，在起伏的山峦间温婉着，遮山蔽野，一碧千里。山外是盛夏酷暑，林间滑动着的清风，却透着丝丝凉意。行至山与山的交接处，与一条小山涧不期而遇。涧水清澈透亮，将手伸进水里，冰凉之意从指尖漫上心头，隐藏在心底的纷乱烦躁悄悄退

却，神志说不出的清明，原来禅在山水间。目光顺水而下，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流将山体冲出一道沟，洗净沙土砾石，露出一条光滑的石道。偏有几丛“不假日色，不资寸土”的菖蒲不识眼色，伸出根须紧抓石缝，非要在石道上争一席之地。水似调皮的孩童，滑下石道，遇菖蒲，无比欢畅地扬起白而透明的水花。菖蒲则逆流而立，一副不屈不挠的模样。“一尘不许渭幽雅，百草谁能并洁娟。”一介荒草，几许倔骨，自古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将它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凝望幽涧中的菖蒲，深思，或许唯有将自己置于死地，才得以脱胎换骨。

夏末山间，天气阴晴不定。一忽儿艳阳高照，一忽儿飘过一片乌云，兜头兜脑地泼下一阵雨，令人措手不及。然而，农家却极爱这种天气，谓之“出菇天”。林间的蘑菇像听了集结令，疯狂地冒出来，这儿一丛那儿一簇，有的洁白如雪、有的灰头土脸、有的红而不妖……还有

的不长菇脚，无法在山间行走，那就借着大树爬向高处。耳状样蘑菇用红黄相间的绚丽波纹装点自己，一路攀爬至树梢。它们也懂得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吗？它们像山林里众妖精的耳朵，爬上高处，凝神谛听凡世间的心思：是否有人觊觎着这片山林？是否扛着斧斤向此磨刀霍霍？

不知是否因我们的闯入太过冒昧了，最后的一场山雨，对我们不依不饶。当我们手脚并用、筋疲力尽地爬至距离山顶最后的500米处，雨从对面山头追了过来。大而密集的雨点，令崎岖的山路更加湿滑。看我们没有退却，山雨落地汇集成流，沿着山路，自上而下，向着我们怒冲而来，一副誓将我们冲向爪哇国的模样；阴沉幽深的水杉林配合着山雨，氤氲起白茫茫的雾气，模糊着我们的视线，羁绊着我们的脚步；闪电似追在我们的脚后跟，一道接一道地劈下来；雷声怒气冲冲，由远及近。在山里兜兜转转近4个小时，体力已消耗到极致，说不出的无助和恐惧从心底滋生。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低着头，弯着

腰，踩着流水，一步一喘地向斗湖进发。当身处绝境，退无可退时，唯有逆境前行，方能摆脱困境。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一行10人，下午2点多到达斗湖之畔的小村落时，已浑身湿冷，饥饿难耐，决定在此留宿一晚。期待太阳落下山巅之时的绝色暮光，邂逅晨起金乌跃出天际、光芒四射的曙光。明早若天气晴好，可见难得一现的云海雾涛。

斗湖是亿万年前火山爆发后的死火山口，由一大两小的湖泊组成，镶嵌在海拔高达千米的山巅万亩草甸中，常年不涸。大湖浑圆如斗，方圆60多亩，因而得名斗湖。位于永泰、福清、莆田三地交界处，有“华东第一天湖”之称。斗湖之畔的自然村分为上斗湖和下斗湖。上斗湖住着黄姓人家，下斗湖是官姓。

据永泰明万历《永福县志》记载：“斗湖山与陈山并峙，上有四湖，寓民张仕荣于湖畔垦为田，稻熟辄鹿豕食；又山高风猛，劳而无获。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徐嘉言实施方广岩，岩僧真湖





躬自开辟，鹿豕远遁，风不为灾。”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上斗湖的原住民小黄说他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搬来此地，官姓先祖则更早，两姓皆由莆田搬迁至此。《永泰县志》的大事志里记载，从明洪武四年（1371）以来，山寇抄掠乡里不断，倭寇从海上而来，侵扰乡民。官黄两姓从沿海而来，穿过深山老林，远避斗湖山巅求生存。

晚上落脚在留守村庄的小黄和他的叔叔家。房屋高两层，为了防潮，底层为青石块砌墙，青石条为柱，二层起土木结构，人字青瓦顶，典型的20世纪农村民居建筑。午后4点，雨依旧不停不歇。我靠在二楼走廊的栏杆上，听雨，看屋前雨中的佛手瓜恣意蓬勃；再往下，村子中央的山谷中，一群白鸭在觅食；黄牛毛色油亮，肚子浑圆，随意地游荡在各家的房前屋后。十几栋民居，依山谷地势而建，虽错落有致，却门窗紧闭，了无声息，有的仅余残垣断壁。牛羊鸡鸭倒是为空寂的村庄平添了几许生气。

然而，从前的村子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两个

村子的人口发展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鼎盛时期，两姓共有二三十户，近200人口，孩子20多个。村庄不大，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村子十分喧闹，对面山头梯田上赶牛犁田的吆喝声，林中的对歌声，学校课堂里的读书声，母亲唤儿声，间或夹杂着水牛的哞哞声。村子里随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女人穿梭在房前屋后的菜园里，种瓜点豆、挑水浇肥；男人在山间劳作，春播秋收；孩子们在课外如山中的猴子，上蹿下跳，嬉笑打闹，满山遍野地找野果子。

曾经，山里的日子比山外的安定，虽不富足却能让族人赖以生存。然而，村子仅有山间古道与外界相连，几乎与世隔绝，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已大大地落后于平原地区，人生的诸多问题慢慢地突显。首先是婚嫁，村里的女孩嫁出去稍容易，男孩娶妻就困难了，山高林深，少有女孩愿意嫁进山里。有男孩的家庭，大部分早早地抱养个女孩，当童养媳。最揪心的还是疾病，小病痛靠村里的老中医，当老中医也



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用竹躺椅加两根棍子绑成简易担架，由村里的男人帮着抬到山下的医院。山高路远，往往人未抬到医院，就失去了生命迹象。然后是教育，村里孩子不多，小学只开设一至三年级，几间土房子，一个民办教师。三年级之后，大都将孩子送往莆田大洋寄读。

1996年，整个村子搬迁。一半人家搬到葛岭镇，另一半搬到福清、永泰城关、莆田大洋。从此，村子空了。如果不是山里的生活太困苦，谁愿抛弃故园迁徙他乡呢？他们离开家园，走出大山谋生，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或重操旧业，上山栽种果树，或贩卖力气打零工。小黄和他的叔叔则怀念曾经在山里自由自在的日子，他们决定回村，以放牧牛羊为生。近年因斗湖被驴友发现，吸引着人来人往，他们兼营民宿，为驴友提供帐篷、炊具和食物。我们的到来，令周围瞬间热闹了起来，叔侄俩话不多，总是憨憨地面露微笑。他们在老虎灶前忙忙碌碌，用大铁锅为我们烹煮青红酒焖羊肉、爆炒佛手瓜、清煮南瓜粥。

傍晚，雨歇。我们稍事休整，终于见到慕名已久的斗湖。面对亿万年的“大地之眸”汪着一泓清澈至极的盈盈秋水，我瞬间无法言语。它一眼望不到底，却将阴郁的天空、翻滚的流云、草场、灌木丛，以及湖边啃着草的黄牛，装进心里。它包容着美的、丑的、无私的、贪婪的、暴虐的世间万象，却波澜不惊。我似与高深的智者相对视，似乎从它的眼眸中看到自己深藏在心底的软弱、不安、焦躁与无奈。逃离湖畔，站上山巅，看鹅舌草将万亩山峦牵绊着、覆盖着、包裹着，悄悄地蔓向最高峰的那一眼湖泊，将一腔绿意从高低起伏的山峦、从四面八方涌向湖水，把一湖的柔波都染绿了。风带着湖水的清凉撩起我鬓边的发丝，抚上脸颊，我的心莫名地安宁而舒畅。

终因漫天的乌云不散，直到沉沉的暮色笼罩四野，我们也未能守候到落日熔金的辉煌。然而，第二天，我们却邂逅了奇妙的云涛雾海，感受到了太阳喷薄而出的新生力量与无限希望。

凌晨5点多，太阳从重重叠叠的山那边一点点地升起，将金红的光线投向天际、群山、湖泊，投向万物生灵。栖息于山野间的仙客精灵也好，世间三千红尘也罢，皆在此时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欣欣然伸了个懒腰。

顺着断崖式的山体，向下望，云雾不知何时将脚下的山谷填满，直至半山腰，而后漫过矮的山头，如瀑般奔涌向另一山谷。看着洁白云海在脚下堆积着、推挤着、涌动着，似海般波澜壮阔，却更显生命的浑厚与至刚。

我将目光投向斗湖。在初升太阳的抚摩下，矜持的斗湖露出了喜上眉梢的欢畅，波纹微微地滑向岸边，似要将金色阳光调入湖中深浅不一的蓝绿色中。对面山脊上几只黄牛列队缓缓向前，如一组动态剪影。蓝天、白云、阳光、山川、湖泊、草甸、黄牛，让我想起《荀子·天论》里的一句话：“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我的心明媚舒朗。

当太阳将山峦、草甸、湖泊、沟壑都涂上一层金光，伸出清亮的脚穿行在林间之时，我恋恋不舍地离开高山之巅的草甸，离开伏卧在草甸中的“大地之眸”。回到村子，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乳白色雾岚从村外丛林里钻出来，快速地漫上村庄，一波一波地汹涌而至，最后将我们密匝匝地裹住。昨天它羁绊我们的脚步，不让上山，今天它用如此质朴而热烈的行动留住我们。只见群山、房子、牛羊、村中水塘上的白鸭皆被拢入其中，影影绰绰，如置身于扯不开、冲不破的混沌洁白的世界。

尘世间诱惑太多，唯有大山最让人动情。真正爱上它的人，爱它的沉稳浑厚，爱它的绝处美艳，也爱它翻云覆雨的善变，更爱它在某个山坳处藏匿的一缕温情。正如恋上一个人，那个人的笑、嗔、痴、闹，都是美好的。



雨中登云天石廊

沉洲

在永泰，我只有两个半天时间，必须登上云天石廊。云天石廊位处福州后花园——永泰青云山风景区主峰状元峰的近山顶处。老天好像有意阻拦，在这两个时段里，天气预报全是中雨到大雨。雨天山道湿滑，自己下决心“舍得一身剐”还说了不算，和景区管委会协商后，下午进山才被首肯。

云天石廊景区约80厘米宽的石阶，麻面，无青苔依附，泡在雨水里的附着力还过得去。海

拔5000米平台，再直上600米，但雨天登山经历极少，也许这是老天搭配的别样景致呢。

很快到了“剑劈石开”景点，一块雨渍斑驳、苔藓丛生的巨石挡道，竟被硬生生劈成两截，石径束身鱼贯过去。南宋时，有本县人萧国梁进京赶考路经此地，抽剑问石，若能高中，剑落石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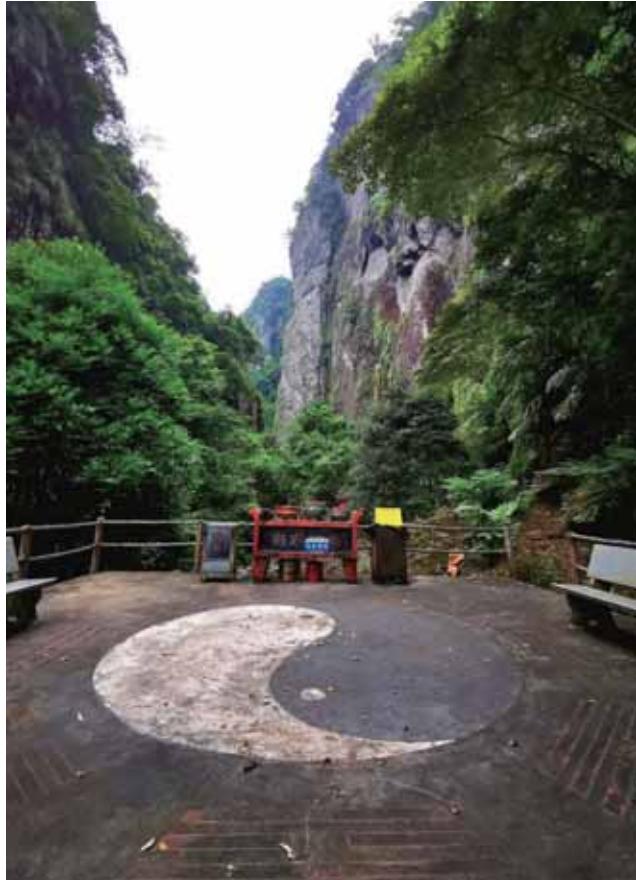
古人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当地县志记载，这座山平地拔起，立其顶伸手可触青云，



状元峰



“剑劈石开”



拜仙台



状元晒靴



状元祖屋

故名青云山。当年，萧国梁在山里筑屋苦读十三载，后来一举夺魁，成为永泰历史上头名状元。此后，当地便衍生一种习俗，学子考试前必登青云山，取平步青云、鱼跃龙门之吉。眼前的这座山分明是一座状元神山，山中与状元相关的景点还有拜仙台、状元晒靴、状元祖屋等。

石阶沿着山谷Z字形向上，森林苍郁底色下，织就白晃晃的稠密雨帘。山涧湍急，溪瀑银亮，有的如雪，有的似练，还有的仿佛丝丝琴弦。空山无语，我们不想湿身，抬不起伞也探不

出头，埋头看脚下石阶。眼前是针阔叶混交林，古树参天，水淋淋的树叶折射着天光，老藤在林间攀缘穿梭，复又垂落至地，林子边上布满郁郁葱葱的大芒萁，舒展叶齿上挑着晶莹雨珠。还能看到树根伸出所有指头，把岩石紧抱于怀。山路边，满目苍翠，草木葳蕤，一副原始森林的情状。

雨帘中登山，本地话叫爬也挺形象，雨中路滑不提，石阶一气不歇地冲天而去，必须放低重心往上拱。很快我便气喘吁吁、一头大汗了。镜片上蒙着白雾，上衣贴上了脊背，鞋子裤管也被

雨水打湿。周遭湿漉漉的，仿佛可以拧出水来。

此时，耳道里似乎有一支交响曲在回荡。天地间，千万粒雨点敲击在千万片树叶上的声音，悠扬饱满，庞大而无际，那是各种弦乐器拉出来的调子；偶有一阵山风掠过，感觉大提琴又幽幽地响彻起来，沉着且厚重；那些大小喧腾的流瀑，以及或高或低淙淙落潭溅起的水声，无疑又是从各种管乐器中吹奏出来的音响。天边不失时机滚过一串雷，鼓声于山谷间骤起，音效壮丽又雄浑。这样的登山过程倒也另有一番滋味。

仿佛为了证明我们逼到了山谷底，两山交合的石缝间亮亮地迸出一线泉水。我们从这里上到另一峰的垭口，Z字形挪移，再折向主峰。

半小时后，我们抵达羚羊洞。这是一片当空兀立的石壁，底部向内凹蚀，形成一个洞穴，洞穴石台上供着当地的一尊什么神仙。“灵芝石！真正的石廊到了。”



灵芝岩

前方矗立起一座灵芝状的岩石，上面被雨水浸成深褐，双向收束下来的底部，呈干燥的灰褐色。里面的地形类似川藏线通麦天险的老虎嘴，更长而已。被侵蚀的岩体后壁呈弧状，在头顶约一米高处前倾探出，俨然一个巨浪劈头盖脸翻卷下来，如同澳大利亚西部海登城的波浪岩。进口处是这条山脊最窄的起头部分，两边同时遭受侵蚀风化，然后喇叭口一样左右分开，环山而去。资料上介绍，青云山主峰及其旁边的两座山峰中，因岩层软硬不同的差异风化，在峡谷绝壁上形成一条条石廊通道，最宽4米，最高6米，大大小小共有十几层，长逾千米。

置身石廊两米来宽的平坦走道，再不见密雨如织，周身干爽，里外两重天地。于此望出去，头顶岩石已是黢黑的一片剪影，雨帘前的石崖上垂落下一缕缕长髯样的绿草，以及几束爆着红鲜花朵的杜鹃细枝。凭栏俯望，山谷里便是原始森林的鸟瞰图。雨中气温没有变化，不见白雾飘袅，周遭绝壁摩空，环围起经雨水反复洗涤过的一池翠绿。新叶漂浮于暗绿的老叶上，阔叶林呈现出一垄垄圆柔隆起的树冠，俨然波涌连连的荡漾湖水。柯树满头米黄绒花仿佛是勾勒出来的一朵朵浪头，那些点点簇簇连成团的粉色高山杜鹃，像是畅游的鱼群吗？

走出石廊，天光四泄。一弯U形石道穿过大芒萁成片的山坳，联结到另一个山头。攀上铁栏杆，果然躺着一条更宽更大的石廊。

因为宽大，石廊上部呈弧状，线条流畅优

美。弧弯处一片片巴掌大的石块层层叠砌，酷似鱼鳞，边上有一座供神的袖珍小庙，四壁是用脱落下来的“鳞片”垒搭。

通常，我们看到的石廊和洞穴地貌，多为沉积岩或石灰岩。青云山风景区高山草甸上屡现的天湖，已经被业界认定为古火山口，这一带的岩体属于火山岩已盖棺定论。由于岩性质地不同，差异侵蚀施以鬼斧神工，剥下一片片岩石，成就了青云山一条条的石廊奇观。

前方一百来米可见主峰山顶，其下的岩壁上，绿树掩映后，裂开一道长条形洞穴，那就是仙人洞，红艳艳的神帐前，隐约能看到神仙们的塑像。

资料上介绍，仙人洞又叫状元洞，长42米，深10多米，高7米。闽人祭拜神佛，自古以来就图个心安理得，不太穷究仪轨和宗教门派，常常是儒释道同居一室。洞内除了三清，还有文昌帝、魁星、护法伽蓝神、武卫、文官、观音、金童、玉女等塑像。因对状元浓厚的历史情结，明朝时，有人还为萧国梁塑了金身，以本地神祇入殿供奉。

从仙人洞回望，对面绝壁险峻，雨渍、地衣患漫的山岩上，现出成条成带节理，被或深或浅地蚀化。刚刚走过的石廊便悬挂其间。千万年来风化的砾石，有的已经碎蚀成土，堆在石廊下方，成为各种植物的落脚地。据说主峰石廊发育最完好，上下共有四层。

绕过大厅似的仙人洞，就此下山。因为雨落

不停和赶时间，途中还有仙足岩、长生潭、女神头像、情侣瀑布、飞瀑三潭、双龙瀑布、灵蛇问天、镇山大钟、天门洞、雷音洞等众多景点，一概没有眼见为实、到此一游过。

雨总算慢慢小了下来，天也有点开的样子。石阶上潴雨水积，泡着柯树花细细的蜷曲花蕊。路边青苔上，还有纽扣大小的四瓣白花，极像高原的点地梅。此为何树之花？不顾雨滴，抬伞仰头，一派鲜绿，找不到对应树冠。不知是爬山时走得匆忙，还是风中大雨摧花，地上尽是残花败叶。油桐花常常在路边的草地铺出一个半圆，野山姜和高山杜鹃的娇嫩艳花饱浸雨水，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枝头。

真是瞬息万变呀，眼看着风慢慢推开铅云，露出斑斑块块的蓝天，树冠上骤然有了太阳的暖色。

我连忙跑进楼去，取出双肩包里的相机。

这里是峡谷的起头，仰首望去，两侧临空兀立的山峦交合处，三座山峰感觉就贴在额顶，垂直海拔600米，直上直下两个半小时，看着让人陡生成就感。状元峰颇似侧身朝天的雄狮头，石壁上茸茸绿树像毛发，张开的大嘴便是状元洞，等那罩着的一缕轻雾扯开，居然能分辨出神帐，那是狮子的血盆大口无疑了。

这下我明白了，绝壁那些绿树成带状的上方，一定都躲着一条石廊。太阳的热气唤醒了森林，白雾一朵朵升腾起来，得来全不费工夫，眼前这一幕绝对是云天石廊地道的本尊形象。

五月白玉兰 (外一篇)

刘欢欢

蝉在枝上一开嗓，5月里的热闹就开始了。天气忙着变热，鸟兽忙着活络筋骨，卖花人则忙着兜售春日。

如果要买花，就在清晨。去红房子前面的树荫底下看看，那里有个卖花老人，她的花比不上店里琳琅多样，但多数是应季的。

5月里卖栀子和白玉兰。

卖花老人用竹篮子盛满新采的栀子和白玉兰，多半时候就在台阶上铺个旧报纸，坐着。隔一刻钟，起身给花洒一些水，保持新鲜。有时她也细致，怕花失了水分，就挨个缠上浸了水的棉条，用细绳子或橡皮圈牢牢缠上几圈，再小心翼翼挨个细细排开，让人想起博物馆里成列的珍宝。那摆在一处的花，多半是清晨时分刚从枝头采摘的，花的枝梗长短不一，斜斜倚在竹篮子里，恬淡而真实。比起店里修剪精致、浸了保鲜剂的，这些花或许有些粗拙，可沾了尘土的生活



气，显然生动了许多。

偶尔有些时日，她采下的花多了，摞在一处挤挤挨挨的，怕坏了品相，便带一张旧席子，就地铺开，把花分散着摞好，等过往的人，一朵一朵买走，余下蹭着、伤着，品相不佳的，待客人挑拣尽了，她就随手簪一支小巧的，夹在鬓发上。

若是恰好黄昏时分，她离开的矍铄背影和被日光掩盖的岁月，会像深渊的藤蔓一样将人缠绕。

的确，时下卖花人远没有旧日子里的虔诚，他们窝在小店，不愿为三朵五朵花开口叫唱，多数时候，他们沉默着，等着客人造访。都说过去，旧日子里卖花人的吆喝声最是迷人，可惜我一回也没听过。

从前，外祖父也说，远远地，你听那卖花人一声唱，春天就破了。小时候听来，觉着卖花人可爱，跟田间布谷鸟一般，一嗓子就能叫破春天，真是厉害。后来，看宋人的笔记，也说，卖花者“歌叫之声，清奇可听”。至于，清奇可听之声是如何歌叫至破春的，我没能听到，一直念想。

宋诗“草色引开盘马地，萧声催暖卖饧天”，虽说，写的是旧时卖糖人吹起管箫招揽客人，但足以推测那旧时卖花人定也似这唱戏般，清远悠长地把花一朵一朵唱给来来往往的客人听。想着那时，你也上街买花，怀里一抱花，走一路，花苞晃晃，香风细细，清曲自花间掉了一路……

城里仓后路两侧，种满白玉兰树，一年里，

多数的季节皆是枝叶蓊郁，路两侧枝条交错横生，遮掩了头顶的天。花开的季节，从底下走过，恰有花落，一片两片散在肩头发间，风穿过去，香气就灌入脾胃，任你心情是好是歹，瞬间就被点亮了。

香附子

乡下的草，多数没有名分，庭前院后光长着热闹，却不怎么受人待见。香附子尤其遭人嫌弃。

老人家称它雷公头，说它们实实讨人厌，是草帮子界的地痞流氓、混混狗子，是恶草。听这口气，厌恶极了。也确实，老人家们多是有经验的农人，吃了香附子的苦，不待见它们，是自然的。

香附子们往往势力浩大，它们起初匍匐在土地里，渐次去占据一点一点的空隙，然后疯狂地蔓延开来，底下球茎的根系可谓盘根错节。之后，趁人一不留神，就缔造了它庞大的种族部落。以至于想要铲除它，得费尽功夫刨，寻到深坑里，断了它的球茎，就连最后的碎屑也不得给它留下，那是隐患，是新的威胁，一丁点儿的灰烬都能让它重新蓄势再发。

要刨它也不容易，工具使不上，就得徒手，有时刨断了上面的茎，暗藏的就找不着了，这样，过不了几个时日，又冒出一丛新茬，叫你窝火；有时看似一小株，但底下连带的茎却可以扯出几尺远。所以庄稼人恼它、恨它，却也拿它

没办法。因为香附子凝结的是种群的力量，它不似蓬草植物，身形孤高，虚张声势。它们同人的抗争是集体的，默默无声的，不依不饶的，仿佛暗自较着劲，铆足了力，一鼓作气抢着赢，就算末了，临近毁灭，也能叫你筋疲力尽，不敢小觑。这样的抗争，顽固而狡黠，但也有它的智慧。

我所居住的岛，岛上多沙质土，风也大，



稍微娇弱的作物就不得生长，庄稼人因地制宜种上了花生，一亩一亩地种。当然，种花生最讲究田头齐整，一丘一垄，犁得明白。经验丰富的庄稼人自然明了，种植的间距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大了，花生不下豆，小了，豆子也不多。到了一定节气，就得下肥。所以，这分寸之间的空隙，就恰恰成了香附子抢占的领地。

春分之后，雨水渐多，花生苗从土里冒出来，香附子也就跟约好了似的，一股脑儿地跟着冒出来。它们毫无章法，毫不顾忌，野蛮地侵入，才不管哪儿是田垄，哪儿是田沟，哪儿它们应该去，哪儿它们不该去。说它们有智慧，恰恰就在这里。起初，它们的叶片还显细软，一阵风刮过去，身子就不耐，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的，叫人见了，以为它们柔弱，不禁风，放松了警惕。记得小时候，我去田里耙草，最喜欢扯香附子的茎叶，稍用点小劲，就听它脆生生地断了，从田头开始，一垄一垄扯过去，没多久，手上就齐整得多了一大把，以为这样容易。不承想，这竟是它使的幌子。而这一切，明白的庄稼人才看得透彻，真正埋在土里的茎块才是心腹之患。祖父从前也说，这雷公头的智慧，在于舍得。舍得当断则断，才守得住该守的。的确，在危急时刻，香附子断尾守宫的招数，像壁虎。

不过，说它狡黠也好，智慧也罢，香附子们应当一丁点儿都不会在意。只是作为小草，为了生存，不妥协地去抗争，去扩张。这应该也是众多草木的共同信念。

草坪之兰

青 色

在植物界，有一种草，它们混迹于杂草丛中，毫不起眼。突然有一天，却开出了精妙无比的兰花。这些兰花出杂草而不染，一刹那惊艳所有的目光。

在华南大地上，就生长着这样三种草坪兰，美冠兰、线柱兰和绶草，它们被植物爱好者亲昵地称为“华南草坪三宝”。很难想象，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有兰科植物与我们如此近距离。

美 冠 兰

三年前，一个榴花开欲燃的季节。我路过宁德师专时，被三株正值花期的台湾相思吸引住。花的香气让我挪不开脚步，索性寻块石头坐下，闭眼遐想。一睁眼，一株 15 厘米高的“芦笋”般植物伫立在眼前。茎秆上端密布着“小芽”，下部长着数片既像鞘又像托叶的瓣状物。搜索先前看过的花草，无雷同。是什么呢？沿着草坪，再次找寻。果然，在“芦笋”不远处发现了另一株和它相似的植物，只是笋尖“小芽”变成了小花。

花色是不多见的橄榄绿，整朵花不到指甲大，但非常精细，有两轮花被，且内轮有一片特别的唇状瓣。

兰科植物？猛然一惊于这一念头。即循着茎秆往下找寻兰科植物独有的假鳞茎。果然！茎秆下便是绿色球状假鳞茎，呈半裸露状态。查了资料，是美冠兰——和彼岸花同样悲情的“花叶永不相见”的美冠兰。细观之下，它的白色唇瓣中有个流苏样淡紫红色的鸡冠状物。据说，这便是美冠兰的名称由来。



美冠兰

回榕后，每每经过草坪，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往草坪上扫。未多久，在省立医院南院的草坪上，再次遇见美冠兰。它的花期已过，如蒜苗般混杂在一堆草丛中。地面上部分裸露的绿色假鳞茎，暴露了它的高贵血统。

去年5月，我专程去了一趟宁德，看望老友美冠兰。曾经碧草如茵的草坪，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一位园林工人正忙碌地修剪着草坪。我的心咯噔一下，在曾经生长着美冠兰的草坪上寻了一遍又一遍，曾经的数十株美冠兰荡然无存，连半裸露的假鳞茎也未曾找到。偌大的草坪竟容不下它们纤弱的身子。夕阳西下，我只能怅然离开。

今年春天，在三江口地铁站附近，我又发现了美冠兰的踪迹。那一个雨天，穿行在小径上，腿裤已被沾满雨水的齐膝野草濡湿。正欲离开，一株美冠兰亭然出现在眼前，花开正当时，绿色的微型花瓣上缀满欲滴的雨珠。风中的它如泣如诉、楚楚动人。

我伏在泥泞草地上，花了半个多小时时间，用相机记录下这迷人的身姿。

有些美丽，应被永久珍藏。

线柱兰

在堇菜科大肆驰骋在城市的草坪之时，线柱兰也在这片土地上如点地梅般冒出。线柱兰是草坪“二宝”，也是草坪兰中最早开花的物种，素有“报春”之誉。

今年3月份，去鼓山涌泉寺赏多花兰，无意中在寺外山坡上遇到了线柱兰。它生长在寺对面的一片草坪上，孑立在一块貌不惊人的小石块旁。每次见到它，都是一副含羞带怯、似喜非喜的模样。三五朵乃至十数朵的线柱兰，如一只只吐着黄舌、奋力张嘴又张不开的燕子，簇拥在一起，互相依偎着、取暖着。清雅、脱俗是对它的最好释义。或许，因了石块的庇护，它才得以保存至今。

3月的鼓山，依然春寒料峭，驰骋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我见过最高也最秀美的线柱兰。尽管它高不到半尺，但仍能看清它红褐色的叶瓣。在略带蜷曲的叶片的呵护下，一串珍珠似的花苞拔节而出，自带傲然仙气。连旁边的长萼堇菜也忍不住探望，争睹其雅致的芳容。线柱兰的花实在



线柱兰

太小，六七朵花聚集在一起也仅手心一拢。而唇瓣更小，为何能成为闻风前来的蜜蜂的降落台？未可知。

线柱兰的拉丁学名来自希腊文“接合”一词，意指它的唇瓣紧贴于蕊柱上。正因如此，我数次萌发解剖它，验证它的唇瓣与蕊柱如何接合的想法，都未达成。花草也有痛感，不忍因一己之私去伤害它。

比起在鼓山草坪上自由生长的线柱兰，农林大学观音湖畔草坪上的线柱兰似乎矮小了许多，充其量只一拳头高。它的茎节短，叶子蜷缩，花朵稀少，完全没有了兰科植物的轩昂气质。或许是行走的人多，又或许是园丁的异常勤劳，这里的地毯草接近光秃，叶尖如荆棘般尖锐、参错，线柱兰只得在叶缝中蜷曲生存。

绶 草

“三宝”是绶草。绶草之名，缘于它的小花盘旋如绶带。其实，更多时候，我觉得它像飘荡在空中的蔡国强的“天梯”作品——螺旋而上，直向碧落。尽管如此，它依然卑微，藏身草坪，没几个人认出它，正所谓“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荒没”。

绶草是《诗经》中首次出现的兰科植物，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兰花。《国风·陈风·防有鹊巢》载：“中唐有甓，邛有旨鹝；谁夙予美？心焉惕惕。”诗中用了几种作者认



绶草

为不可能出现的存在，如“用瓦铺路”“山上长鶡”等，来表达心中的忧思。这里的“鶡”，便是绶草。事实上，山上向阳、较湿润的地方仍可以生长绶草，古人也有认识上的局限。

6月的榕城，姹紫嫣红，花树一树比一树艳丽，一枝比一枝繁茂。在花树环绕的草坪上，纤弱的绶草抽节拔茎，开出成串的清丽无比的花，瞬间照亮暗淡的草坪，让满园花枝招展的花树黯然失色。那一刻，它开出了兰科植物的壮丽与清气。虽落入凡间，但体内奔流的还是兰科植物的浆汁。

在榕城，植物爱好者见过最多绶草的地方是在福建博物院的草坪上。“唉，又听到割草机的轰鸣声”“园丁怎么这么勤快，又在除草了”“我似乎听到了绶草的哀号声”，每次探花回来，总有花友叹惋与心痛。尽管如此，绶草仍年复一年地倔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那时，我最想做的事，是给它们披上一条绣着金字的红绶带。

千秋福州山水榕

邱泰斌

民谚称福州为“三山骨、闽水魂、榕树根”。

山 骨

福州别称“三山”，外为群山环抱，内有诸山显翠。谚有“一旗二鼓三高四虎”四座外山之称，有“左鼓右旗，全闽二绝”之赞。还有“城在山中，山在城中”“三山隐、三山现、三山看不见”之说。

中国百姓谓“三”“六”“九”为多之意，虚指；“三山现”则为实指，一般人认可其为屏山、乌山、于山。

有福之州，三山鼎立，两塔对峙，一楼镇海。

“闽之有城，自治城始”，而冶城建于冶山。

冶山为屏山余脉，位其山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里是闽越国开基立业之地。于是，无诸成为闽越国第一位国王，也是福建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统治者；闽越国成为汉时东南一带势力最强盛的国家，带给福建一派“吴越气象”、江南风情。

“越王故国四围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元萨都刺《越

台怀古》）

治城之后，福州依次建了子城、罗城、夹城、外城等城垣，蔚成一条千年绵延的古城传统中轴线，起承转合，文脉绵延，珠联璧合，链串九珠：屏山治山、鼓楼、三坊七巷、朱紫坊、于山、乌山、上下杭，跨闽江至烟台山。

福州城市布局，坐北朝南，“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以屏山治山为发端，于山、乌山相对峙，如今的八一七路为发展中轴、古城核心，向南，向江逐海，集聚了2200多年建城史中大量的积淀，汇聚了众多的历史古迹和福州城市文化内涵。

近代之后，福州市区扩张加速，台江、仓山依靠闽江码头，城区由屏山到烟台山，经狭长的茶亭街，像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三山两塔”，另一头挑着南台商业区及洋人仓山区，呈哑铃状布局，呈中字形发展。

“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宋·陈轩《冶城》）

烟台山，五口通商开埠之后，曾是福州对外开放交流的最前沿，在泱泱闽江即将投奔大海怀



抱之时，犹如马良挥动了神来之笔，勾勒了“琼花玉岛”，造就了百年辉煌，成为世界走进中国、福州走向世界的窗口，见证了福州城市的发展历史与变革。

史上长乐，如今滨海新城，是一块与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区域。从春秋到唐宋，吴航儿女借舟楫之便，主动融入海的呼唤，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程。

永乐年间，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在长乐、琅岐闽江口伺风开洋，接壤外洋，开创世界航海史先河，揭开世界大航海序幕，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

时至20世纪90年代，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构建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吹响了向海进军的号角！

近些年，福州“修旧如旧”，先后复建提升了屏山公园、镇海楼、冶山春秋园、西湖公园、

三坊七巷、朱紫坊、乌石山景区、于山风景名胜公园、茶亭街、茶亭公园、上下杭和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等。

福州长乐滨海新城、琅岐岛新区，正开辟并加速着沿江向海新时代的新海丝建设。仅2017年就实施了6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500亿元。

水 魂

福州是一座典型的水城。

“西北则诸山环绕，东南则双江（指白龙江、乌龙江，笔者注）带流，洪江内抱，台江外卫，此郡城之形势。”（《榕城考古略》）

“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地理形胜，大美大巧，智者爱水，水磨功夫。

“相传无诸时，四面皆江水。”（《三山志》）

晋太康郡守严高筑子城，背倚越王山，三面临水，随着海水渐退而渐露陆地。



唐宋之后修筑的古城区，都注重护城河等水域的修建疏浚、保护传承，延续至今。

闽江之水闽北来。闽江源自武夷山脉，滔滔东流，至南台岛古淮安分为南北港：北港（白龙江）穿过市区至马尾港；南港（乌龙江）绕南台岛南侧，至江口接纳大樟溪后出峡兜至马尾。折向东流出琅岐岛，南北港汇合后折向东北，再穿过闽安峡谷至亭江又分为两支：南支经长乐梅花入东海；北支经连江琯头至长门后被岛屿分割为四汊，注入东海。

福州内河外江，潮汐互通，“二潮吞吐，缭绕若带”，造就了独特的双抛桥、文庙、上下杭等“合潮”景观，为全国罕见。城区河网密布，水系发达，特别是晋安河、白马河呈“双龙送水之势”，光明港全程改造提升后长达6.8公里。

安泰河自唐五代始为罗城护城河，从古至今，南北串起三坊七巷、乌山风景区、朱紫坊建筑群等景区景点。“三坊七巷记旧游，晚凉声唱卖

花柔。紫菱丹荔黄皮果，一路香风引酒楼。”（清刘心香诗）

有福之州史上曾“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宋龙昌期《三山即事》）。

近年，福州结合城区水质综合整治，实施内河改造提升，疏浚河道，截污补水，修建驳岸，构筑栈道，植树栽花。终使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繁花似锦，移步换景，串珠公园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近年百条景观河建起串珠公园千座，犹如游龙献瑞，天女散花！“清水穿城过，人在画中游”。

有福之州，幸福之城，一步一步，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榕 根

闽水泱泱，闽都皇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史上一群群鸟儿南徙飞翔，江风阵阵吹起，带来了榕树的种子，和煦的春风把它们散播。沧海桑田，于是，榕树由城外一步一步地向城内登陆，郁郁葱葱遍及全城。

榕城古榕名榕往往与道教联姻，榕树奇观往往与飞榕结缘。“全闽第一江山”、“编网榕”、唐宋遗传物“龙墙榕”、净慈古榕……而晋朝便已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于山（九仙山）不知日月长的“寿岩榕”等，给世人留下了“活的文物”。

有福之州人工植榕，自唐宋元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起承转合，蔚成薪火传承的政风民俗。

宋代为福州历史上植榕的鼎盛时期。福州历史上植榕个性张扬极致莫过于太守张伯玉。“三年清知府，十万绿榕树”，“编户植榕”，之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以致谈到榕树与榕城，世人只知有伯玉，而不知有他人。

千年之间，有福之州简称榕城。

榕树最通灵性人性，最能造福庇荫乡人世人，犹如母亲千秋参天大树！其间不乏佳作颂词。如南宋理学家薛季宣的《大榕赋》，明著名学者黄道周的《榕颂》，清福州郡守李拔的《榕荫堂》跋。福建乡亲、宋丞相李纲《榕木赋》赞之：“南有巨木，其名曰榕，下蟠据于厚地，上荡摩于高穹。雨露之所零（古代求雨祭礼）润，雷霆之所震耸，日月之所照烛，乾坤之所含容。”“垂一方之美荫，来万里之清风”。冰心老祖母由衷地赞叹故乡的榕



树是伟大的树。著名作家郭风低吟浅唱激越清新的散文诗《叶笛》：“呵，故乡的叶笛。那只是两片绿叶，把它放在嘴唇上。”

榕荫冉冉，叶笛声声，诗情画意，宜业宜居。

千百年间，榕城人终身、世代繁衍生活在榕荫、福荫之中。

榕树之美，叶如乌云，须如美髯，其根尤为强大与千姿百态。你看，榕城榕树随处可见，榕须随风飘荡，榕根盘根错节，根多且深，多姿多彩：在地上有树根，在空中有气根，气根触地，根又生根，根深蒂固，博大精深，生命顽强永恒。

榕树横跨于历史长河之上，生命深处千丝万缕的发达根须，紧紧系住榕人的心，勾住游子的魂。往往一棵树，一个故事，一处胜迹；一种树，一份情结，一座城市。

榕树根，生命之根，生态之母。